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等还是精英/(英)巴特摩尔著;尤卫军译;斐池校.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4751-3

I. 平… II. ①巴… ②尤… ③斐… III. 政治理论 IV. 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410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越南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陶雪华
责任校对 马 慧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625
字数 107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10,000 册
定 价 5.60 元

目 录

平等的理想 精英的现实——代序	刘军宁
第一章 精英的概念及其意识形态	1
第二章 从统治阶级到权力精英	16
第三章 政治与精英的流动	36
第四章 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官僚	53
第五章 传统性与现代性：发展中国家的精英	73
第六章 民主与多元化精英	88
第七章 要平等还是要精英？	101
主要参考书目	118

第一章 精英的概念及其意识形态

“精英”(élite)一词,最初在十七世纪是用以形容质量精美的商品,后来才用以表示地位优越的社会集团,如精锐部队和上层贵族。^①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精英”一词在英语中的出现始于1823年,当时该词已被用来表示社会集团。但是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和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和美国,这一词语才广泛运用于与社会及政治有关的著作中,并通过社会精英理论特别是帕雷多(Vilfredo Pareto)的著作,

^① 见 *Dictionnaire de Trévoux* (1771年版)。这里给“精英”一词所下的主要定义是：“商品中的精品。”后面又加上“这个商业中的店铺用语中又派出其他用途……(精锐部队,贵州精英)”[引自伦佐·塞雷诺(Renzo Sereno)所著“加塔诺·莫斯卡的反亚里士多德哲学及其命运”,《伦理学》(*Ethics*), XLVIII(4), 1938年7月,第515页]。根据埃德蒙·于盖(Edmond Huguet)的《十六世纪法语字典》,“精英”一词仅指选择(choix); faire élite 意为“挑选”。关于这个词本身和精英思想的早期含义,还可参见 Hans P. Dreitzel 的 *Elitebegriff and Sozial Struktur* 及 H. D. 拉斯维尔 et al. 的《精英之比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关于社会应由一群杰出人物统治的思想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已具雏形,在后来控制了古代印度社会的婆罗门教的(Brahminical)的种姓学说中又有新的发展。在对于社会理论仍具主要影响的另一种形式中,很多宗教教义用“上帝的选民”的字眼来表达精英的概念。当代关于精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概念可追溯到圣西门(Saint-Simon)关于提倡由科学家和实业家进行统治的主张,但在圣西门的著作中,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特别是他承认阶级差别和贫富之间的对立,这使得他的紧密追随者将他的思想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只有在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哲学中,圣西门思想中精英及权力主义部分才得以同戴·博纳尔(de Bonald)的思想结合起来并被恢复其显著特征,因而直接影响了莫斯卡和帕雷多这两位近代精英理论的创始人。(注释中所引用的著作的详细情况可在本书后的主要参考书目中找到。)

得到广泛传播。

帕雷多给“精英”一词下了两种定义。首先他使用了一个一般的定义：“我们假定在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中，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他的能力标志的指数，这就像在学校里不同科目考试的分数—一样。例如，我们给水平最高的律师打10分，给没有主顾的律师打1分，而0分则留给那些十足的白痴。对那些百万富翁———无论其使用诚实的抑或欺诈的手段获得财富———我们将给他10分。对那些收入丰厚、生活优裕的人，我们给他6分；对那些尚可维持生计的人给1分，0分留给生活贫困的人……，对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照此类推。因此，让我们把那些在各自—活动领域中—获得最高指数的人—确定为一个阶级，并将其命名为精英阶级。”^①帕雷多自己没有继续使用精英的这一—定义。这个定义仅仅用以强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个人天赋的—差异，并作为“统治精英”(governing elite)概念的出发点，这才是他的主旨所在。“就我们在研究社会平衡方面所从事的特别调查而言，如果我们将这个阶级(精英阶级)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级，那将是有助于研究的：即由那些直接或间接在政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所组成的统治精英和由其余的人组成的非统治精英……—这样全体居民便可分为两个阶层：一、低级阶层，即非精英阶层，这个阶层对政府可能具有的影响我们暂且忽略不计；二、高级阶层，即精英阶层，又分为两部分：(1)统治精英；(2)非统治精英。”^②

从帕雷多的早期文章中不难发现他是如何得出这一概念的。他在《政治经济学教程》(*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③中就

① V. 帕雷多：《心智与社会》，第三卷，第1422-1423页。

② V. 帕雷多：《心智与社会》，第三卷，第1423-1424页。

③ 洛桑(Lausanne)，1896-1897年。

已提出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正常曲线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Les systèmes socialistes*)^①一书中,他继续论证道:首先,如果根据其他标准,诸如智力水平的高低,数学天赋的大小,音乐才能的多少,道德品质的好坏,来排列个人的位置的话,其结果大致会出现与财富分配曲线相似的曲线;其次,如果根据人们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力或影响来排列其位置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在大多数社会中,同一个人占有的权力的等级和他占有的财富的等级是一致的。“所谓上层阶级的人通常也是最富有的人。这些阶级即为精英,它们是‘人类的精华’……”^②

但是,在《心智与社会》(*The Mind and Society*)一书中,这个问题在形成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个重要区别,这里帕雷多所关注的并不是某种物质(包括权力及影响)的分布曲线,而是那些当权者即“统治精英”和那些无权者即群众之间的直接对抗。帕雷多在概念上的这一变化很可能归因于莫斯卡(Gaetano Mosca)的著作,后者是最先系统地提出“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区别——虽然使用的是其他字眼——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门新的政治学科的人。^③莫斯卡是这样阐述他的基本思想的:“在存在于所有政治制度中的经久不变的现实与趋势当中,有一种现象是如

① 1902年巴黎第一版;1926年第二版。

② 见该书第28页。

③ 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由亚瑟·利文斯顿(Arthur Livingston)编辑这一英文版,将莫斯卡的*Elementi di Scienza Politica*书的两个版本合并,对其中的章节重新安排。(第一版出于1896年,第二版,即修订版出于1923年)。最近对莫斯卡的卓有成效的研究——J. H. 迈泽尔的《统治阶级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Ruling Class*)——明确指出莫斯卡的学说的主要部分形成于他的第一本书*Sulla Teorica dei governi e sul governo parlamentare: Studi storici e sociali*(都灵,1884年版)并阐述了这一学说怎样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得到发挥和修改。迈泽尔还极为公正地讨论了莫斯卡和帕雷多思想的关系(参见该书第八章),并认为很难(像莫斯卡所说的那样)指责后者有剽窃行为;不过,帕雷多后来对政府精英的解释看起来是有些像出自莫斯卡的学说。

此明显以至于最漫不经心的眼睛也不会将其忽略。在所有社会中，——从最不发达的、刚刚出现文明曙光的社会直到最发达、最强大的社会当中——都存在着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第一个阶级——其人数总是非常有限——执行所有的政治职能，独揽大权，并尽情享受权力所带来的种种荣耀，而第二个阶级——人数众多的阶级——却受到第一个阶级以一种或多或少是合法的、专断的和强暴的方式的统治与支配……”^①莫斯卡以下列事实来解释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前者是有组织的，“……由一种单一的动力所指引的组织严密的少数人对一盘散沙般的多数人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少数人的力量的凝聚对于多数人当中任一个个人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因为这个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有组织的少数人的整体。与此同时，少数人正是由于他们是少数才组织起来，”——而且还由于少数人通常是由杰出的人所组成——“……居于统治地位的少数人一般都真正地或明显地具有某些品质，这些品质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备受推崇并且很有影响。”^②

因此，无论是莫斯卡还是帕雷多，在使用“精英”一词时所考虑的都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或者能够直接运用政治权力，或者处于能够对政治权力施加强大影响的地位。同时他们二人还意识到，“统治精英”或“政治阶级”本身就是由与众不同的社会集团所构成的。帕雷多评论道：“上层社会，或曰精英，名义上包含一些被称之为贵族的未经严格定义的人群。”他进而提到那些“军事贵族、宗教贵族、商业贵族以及财阀统治集团。”^③帕雷多的一位法国学生玛丽·克拉宾斯卡(Marie Kolabinska)在一项对精

① 莫斯卡：《统治阶级》，第50页。

② 莫斯卡：《统治阶级》，第53页。

③ 帕雷多：《心智与社会》，第三卷，第1429-1430页。

英的研究中将这一观点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她详细论述了统治精英内不同的亚集团(subgroup)之间的个人活动,并且开始比较全面地考察富翁、贵族、军事贵族和神职人员这四个集团的历史。^①然而帕雷多却一直倾向于强调统治精英和非精英集团之间的分野。是莫斯卡更加全面地考察了精英集团本身的构成,特别是在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情形。因此,他提到“那些据以划分政治阶级的各种党派组织”,这些党派不得不全力争取人数较多的阶级的选票。后来他写道:“毋庸置疑,(政府的)代议制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参政提供了机会,因而可以平衡并制约某些社会力量的影响,特别是官僚的影响。”上述最后一段话表明,帕雷多与莫斯卡在解释政治制度的发展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而且他保留了对当代“民主”、“人道主义”以及“进步”诸概念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另一方面,莫斯卡则准备承认并有保留地赞同当代民主的显著特征。的确,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中,他写道,在议会民主中,“代表并不是由选民选举出来的,作为一条规则,他是使自己被他们选中的,……或者……是他的朋友们使他当选的。”但在后来的著述中,他承认,人口占多数的大众可以通过其代表对政府政策保持某种控制。正如迈泽尔(Meisel)所指出的,只有在批评马克思时,莫斯卡才明确划分大众和少数人之间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微妙、更为复杂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政治阶级本身是处于(代表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力量”以及由法律所体现的整个社会的道德的一致性的影响和控制之下的。在莫斯卡的理论中,精英人物并不仅仅以暴力和欺骗手段进行统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还“代表”着有权有势的社会集团的利益。

在莫斯卡的理论中还存在着另一种观点,它修正了该理论

^① 玛丽·克拉宾斯卡:《法国精英的流动》(*La circulation des elites en France*),第7页。

的原始框架。在当代社会中，精英人物并未被抬到脱离社会其余成员的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通过亚精英(sub-elite)与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亚精英是一个大得多的集团，出于各种目的与动机，它包括了由公职人员、管理人员、白领工人、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其他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整个“新的中产阶级”。该集团不仅为精英(狭义指统治阶级)提供后备力量，而且其本身就是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莫斯卡认为“任何政治体制的稳定都有赖于这个第二阶层的道德素质、智力水平及活动能力。”因此，葛兰西(Gramsci)的评论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莫斯卡的“政治阶级概念……是一个含混不清的、让人迷惑不解的概念。人们无法确切地了解莫斯卡究竟指的是什么，因为这一概念变化无常。有时他看起来似乎指的是中产阶级，有时仿佛指的是所有的有产者，有时又好像是指那些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但在另外的场合，我们又可以明显看出莫斯卡要表示的是政界人士。”^① 后来，葛兰西更加明确地宣称：“莫斯卡所说的‘政治阶级’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莫斯卡的概念与帕雷多的精英概念十分相似，后者也试图解释知识分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一历史现象。”^②

因此，莫斯卡和帕雷多留下的概念体系是由下列一些共同的观念所组成：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而且必然存在着统治社会其他成员的少数人；这一部分人——“政治阶级”或“统治精英”，是由占据了政治领导地位的人所组成的，或者用一种更为含混的说法，是由那些能够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人所组成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马基雅维利的笔记》(Note sul Machiavelli)。

^② 安东尼奥·葛兰西，出自他的狱中日记(1932年)，发表时名为 *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

的，——他们每过一个时期都要经历地位的变迁，通常由来自社会中较低阶层的成员进行补充，有时这种变化来自新的社会集团的参与，偶尔也由“反精英”(counter-elite)所组成的新的精英集团所完全取代，例如革命发生时的情形。这一现象，即“精英人物的流动”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加考察。帕雷多和莫斯卡的观点在这里开始出现分歧。帕雷多更加坚持一切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并且反对关于民主政治制度不同于其他任何社会制度的观点。^① 他主要使用诸如剩余观点(情感)这样一些心理学方面的术语来解释精英的流动，就像他在《心智与社会》里前面的章节中所不厌其烦地叙述的那样。另一方面，莫斯卡则更加明了作为政治阶级中的上层的精英本身的多样性，精英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多样性，以及在当代社会中，精英主要通过政治阶级中较低的阶层，即“新中产阶级”，与社会其他成员所保持的密切联系的多样性。故莫斯卡也同意在现代民主制度和其他类型的政体之间存在着差别。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承认在少数统治者和大多数民众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而不仅仅是前者统治后者的关系。最后，正如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一样，莫斯卡也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精英流动的原因，他认为新一代精英的崛起(或精英中新的因素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代表新的利益(例如技术的或经济的利益)的社会力量的出现所导致的。^②

① 除了民主思想的影响之外，统治精英在执政过程中仍有可能显得优柔寡断及力不从心。这是帕雷多的科学论点和他的政治学说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在民主制度下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统治精英，可是帕雷多却对民主制度横加指责，似乎民主对这样一种精英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② 参照迈泽尔上述著作第303页：“莫斯卡的社会力量一词就像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一样准确地反映了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随着新的需要的不断出现，不断有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以迎接挑战并要求在旧有利益所掌握的权力中分享份额。”

此后人们对精英的研究在重视政治权力问题上继承了帕雷多和莫斯卡二人(特别是后者)的衣钵。拉斯维尔(H. D. Lasswell)无论是在他早期所写的受到莫斯卡本人推崇的文章中,还是最近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里进行的研究精英的工作中,都特别致力于对政治精英的研究。他用下列词语对此进行了阐述:“政治精英是由政治实体中的当权者所组成的。当权者包括领导者及其据以产生的社会组织(social formations)。并且领导者在一定时期内对该社会组织负有责任。^①在这方面帕雷多和莫斯卡的定义的区别在于,这里所说的政治精英与其他同权力运用并无多大关系的精英是有所不同的,尽管那些精英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而且作为精英的后备力量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阶级)的观念被重新放入它曾被抛弃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帕雷多的理论——当中。正如我们马上便可以看到的那样,有关精英的思想最初是作为与关于社会阶级的思想相对立的理论而产生的。在雷蒙·阿宏(Ramond Aron, 一译阿隆)的著述中也明显存在着类似的情形。他也从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的意义上来考虑精英,不过他曾试图在精英与社会阶级之间建立某种联系^②,坚持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精英应该是人数众多的。他还考察了通常并不构成政治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的知识精英的社会影响。^③

对精英的定义所进行的新的论释要求采用比迄今所使用过

^① 拉斯维尔,见拉斯维尔、勒纳(D. Lerner)和罗斯韦尔(C. E. Rothwell)所著《精英研究之比较》(*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

^② 雷蒙·阿宏:《社会结构和统治阶级》,第一部分,《英国社会学报》(*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50年,第一期:“将‘阶级’社会学和‘精英’社会学综合到一起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可以转化成下列较为简单的问题:‘当代社会中社会演变和政治等级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③ 见阿宏著《知识分子的麻醉剂》(*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伦敦,1957年版。

的词语更加明确清晰的术语。^① 国际上，“精英(们)”一词现在已通常用以表示(无论何种原因)处于社会上层的举足轻重的专业集团,由此我将毫无保留地根据这一含义使用这个词语。对于这类精英的研究已经在下列几个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精英的范围,其各种类型的数量,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产生政治权力的集团之间的关系。上述这些因素都是在区别不同类型的社会和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时需要加以考虑的极为重要的事实。同样,精英的封闭或开放的性质,换言之,精英的后备情况的特点及这一特点所显示出的社会流动情况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精英”一词一般指的是这些具有影响的集团,那么我们将需要另外的词语来表示统治社会的少数人,他们从绝对意义上说并不是这种具有影响的集团,并且由于他们对社会是如此重要,因而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称谓。这里我将采用莫斯卡的术语,“政治阶级”,来表示那些运用政治权力或影响并直接参与争夺政治权力斗争的集团。我还将从政治阶级中分离出一个更小的集团,即“政治精英”,它包括那些在任何特定时期里在社会中实际运用政治权力的个人。这样,我们便可比较容易地确定政治精英的范围:它将包括政府以及高级行政机构的成员、军事领导人,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贵族和皇室中对政治颇具影响的家族以及实力雄厚的经济企业的巨头。确定政治阶级的范围则比较麻烦,当然它将包括政治精英,还可能包括组成在野党领袖的“反精英”、新的社会利益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例如工会领袖)、企业家集团以及活跃于政坛的知识分子。因此,政治阶级是由一系列集团所组成的,这些集团彼此间存在着不同程度

^① 在《欧洲社会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0年第一期上所载的“社会阶级、政治阶级、领导阶级”一文中,雷蒙·阿宏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我参照了他的论点。

的合作、竞争以及冲突关系。

政治精英的概念是由莫斯卡和帕雷多作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中的关键性的词语提出来的。^① 但这一词语在他们的文章中还有另一层较为明显的含义：即它包含了反对或者批评现代民主，并且更加反对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学说的成分。^② 弗里德里克(C. J. Friedrich)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十九世纪流行于欧洲的关于由杰出人物组成的精英进行统治的种种学说——包括卡莱尔(Carlyle)的英雄哲学、尼采的超人观以及莫斯卡、帕雷多和布克哈特(Burkhardt)的朴实无华的理论——都是“迄今仍存在着大量封建残余的社会的产物”。这些学说记录了为修正古老的社会等级观念，同时为民主思想的发展设置障碍所做的种种努力。^③ 卢卡奇(G. Lukács)认为上述学说是在更加狭小的背景中产生的。他提出政治统治问题是那些未能真正建立资本主义民主的国家中的社会学家的所提出来的(即在封建势力仍有很大影响的这些国家中)。他还指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奇里斯玛”(charisma)观点(在德国)和帕雷多的“精英”概念(在意大利)两者的相似之处，并说明两者都是偏见的典型表现。^④

可以从两方面表述精英思想与民主观点的相悖之处：首先，精英思想坚持认为个人在天赋方面存在着差异，这与民主政治

① 两位作者都极力坚持他的所从事的研究的现实性和科学性，他的在这方面的成就在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The Machiavellians*)一书中得到充分的肯定。

② 对社会主义的学说及其运动所持的批判态度是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的《政党》一书中的显著特点，对此后面还将讨论。

③ 见弗里德里克所著《普通人的新形象》(*The New Image of the Common Man*)

④ 见卢卡奇所著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思想中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后者倾向于强调个人间的基本平等;其次,关于少数统治者的观点同关于多数人统治的民主理论是背道而驰的。但两者间的这种矛盾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严重。如果民主主要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的话,那么可以像许多人已经做过的那样,相信“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即多数人的有效统治)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可以认为政治民主的主要意义在于社会的权力地位在原则上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权力竞争是存在的,当权者必须对全体选民负责。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了一种得到广泛赞同的民主观点。他把民主的方式定义为“为达到政治决策的目的所作的制度性安排,其中个人是通过激烈竞争选票才得以获得决策权的。”^① 与他相似的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他在更早的时候就在精英理论家的观点中发现了关于“直接行动”和无条件服从领袖的荒谬的论证。^② 后来他认为这些理论同民主是彼此相容的:“……政策的确是在精英的手中形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因此而失去民主,因为虽然每个公民无法自始至终直接参与政府工作,但他们至少有可能每隔一段时间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愿望,这对民主来说也就足够了。”^③

此外,同样可以认为,即使民主不仅意味着包含政治制度的内容,它仍然可以同精英思想彼此相容,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民主所要表达的平等观点很容易被重新解释为“机会的平等”。这样民主将被当作一种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领域中的精英——原则上将是

① 见熊彼特所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② 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1929年英译本及1936年版,第119页。

③ 见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文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开放的”，实际上其后备力量也是根据各人的才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个关于精英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的观点实际上源于精英流动的理论，并在莫斯卡的著作中有明确的论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讨论过的两种观点——政治角逐和社会平等的观点——可以作为自由（或 *Laissez-faire*——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必然结果。熊彼特对此说得十分明了：“这个（争夺政治权力的）观点提出了同关于在经济领域中竞争的观点相似的困难，两者对照将不无裨益。”^① 后来，有一位作者写道：这两者间的联系仍然是十分密切的：“……精英理论从根本上说不过是经过粉饰的社会 *laissez-faire*。有关受教育机会的理论只不过是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翻版而已，所强调的是竞争和‘我行我素’（*getting-on*）。”^②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帕雷多和莫斯卡（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精英理论同民主的一般思想并无相悖之处。这些理论真正的对手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莫斯卡写道：“在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上，只有当一种现实的政治科学成功地推翻了目前充斥于社会研究领域的形而上学的和乐观主义的方法之后……社会主义才会被遏制。”这种被帕雷多、韦伯、米歇尔等人以不同的方式向前发展的“现实科学”的首要宗旨就是在两个基本观点上反驳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第一，通过揭示精英的不断流动现象来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流动阻止了一个稳定及封闭的统治阶级在大多数社会，特别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形成；第二，阐明无阶级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每一社会中都有着，并且必然存在着，实际进行统治的少数人。正如迈泽尔所恰如其分地评论的：“精英原本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概念……（在马

① 见上面所提的熊彼特所著书中第 217 页。

②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第 236 页。

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无产阶级将成为最终阶级并将进入无阶级社会。并非如此。实际上,一切社会的历史,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历史,都是该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历史……统治阶级将永远存在,因而剥削也将永远存在。这便是十九世纪最后十年间出现的精英理论反社会主义特别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①精英理论同样也采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反对社会主义学说,即采用关于精英是依靠超人天赋进行统治的观点取代关于某一个阶级依靠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行统治的观点。正如克拉宾斯卡所说,“……‘精英’一词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关于优越的观点……”^②

上述对精英理论中意识形态部分的思考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正像我所提到过的,精英思想和民主社会理论是有可能彼此相容的,然而,早期精英理论的倡导者却对民主制度怀有明显的敌意(尽管莫斯卡在经历了法西斯在意大利的统治之后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的立场,并且变成了民主政府的某些原则的警惕的捍卫者),而且这种敌意在卡莱尔和尼采等人那里表现得更加清楚。他们所提出的与其说是政治学方面的科学理论,毋宁说是一些社会神话。对于这一点又该作何解释呢?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以另一种眼光将民主视为显然将要导致社会主义的“群众造反的舞台”。因而他们在批评民主的时候是在间接地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还应进一步指出的是,精英理论家们本身对民主的新的定义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例如熊彼特,他在这方面影响当时被认为同精英思想是

^① 见上面提到的迈泽尔所著书,第10页。

^② 见上述克拉宾斯卡所著书,第5页。纳德尔(S. F. Nadel)在其“社会精英的概念”(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简报》(*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1956年第八卷)一文中也强调了“社会优势”(social superiority)是精英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却忽略了这一概念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并行不悖的。这些社会思想的发展也影响了当代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讨论。

精英理论的另一个特点近来在许多与社会主义相悖的社会理论中重新得到了体现，即当这些理论家批评他们发现的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决定论时，他们自己又在逐渐建立另一种不折不扣的决定论。这些精英理论家的基本论点并不仅限于所有已知的社会都被分成两个阶层——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和被统治的多数人——而且还包括关于所有社会都必须如此划分这样一个观点。这里所包含的决定论的因素同马克思的决定论相比难道不是半斤八两吗？因为无论人类是被迫进入无阶级社会还是注定无法进入无阶级社会，他们不都是同样不自由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上述两种情形不可同日而语：精英理论家仅仅排除了一种社会出现的可能性，而保留了其余的可能性（莫斯卡还声称在社会科学中，预言什么永远不会发生要比预言什么注定要发生更加容易一些），而马克思主义者却预言某一特定的社会形式注定要成为现实。但是人们同样可以说，精英理论家——特别是帕雷多——正在宣扬某种政治社会的存在是普遍的和必然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否认这个“精英与群众规律”是普遍正确的，并维护着人类想像和创造新型社会的自由。一言以蔽之，两种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社会决定论的色彩。

我提及这一问题的目的只是为了揭示精英概念中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二者之间的联系。这一概念涉及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并在寻求解释社会事件特别是政治变迁的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这一概念是在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激烈辩论的过程中，因而可以立即赋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意义这样的背景之下，在社会思想中崭露头角的，并在具有公开宣布其意识形态倾向的特点的学说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更晚些时候，即使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post-ideological age），这

一概念也不应被视为纯粹科学的产物。由于能够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及活动产生影响,因而社会学中的所有观点及理论都有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这种影响要么是由于这些观点来自某一社会学说,要么是因为在排除任何直接的学说影响之时,仅仅注意和强调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但却忽略了另外一些方面,因而诱使人们根据某一套观点而非其他的观点思考他们周围的环境及他们可能遇见的未来所造成的。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批判某一概念系统或理论,不仅是为了表明它与某一范围更广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学说之间的联系或用另一社会学说来反对它;这种批判还是为了,或者说主要是为了揭示这些观点和理论在科学上的局限性,并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能够更加真实和更为准确地描述在社会范围内实际发生的事件。接下来我将主要关注对精英思想所进行的这样一种批判性的考察,只有到了本书的结尾我才会回过去讨论科学理论未能圆满地表述的彼此激烈竞争的各种社会学说。

第二章 从统治阶级到权力精英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莫斯卡和帕雷多在反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反对给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带来了理论活力和自信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过程中流露出创立一门新的政治科学的迫切心情。那么这个被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称之为“马基雅维利式的”^①新科学是否优于马克思的社会阶级冲突理论呢？

马克思的理论可以扼要表述如下：

一、在除原始社会以外的一切社会中，都可以区别出下面两类人：

(1)一个统治阶级，以及(2)一个或多个被统治阶级。

二、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是由于占有主要经济生产工具所决定的。但是其政治主导地位则是通过军事力量和宣传为其利益服务的各种各样的观念所建立的对社会的控制而得到巩固的。

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的性质和过程主要受到生产力的发展，即技术更新的影响。

四、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冲突的阵线显得泾渭分明，这是由于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利益的差别已变得格外突出，而且没有被封建社会的那种人身契约关系所掩盖；由于通过将财

^① 詹姆斯·伯纳姆：《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The Machiavellians*）。

富空前地集中于社会的一极并造成贫困的另一极,通过逐渐消灭中间的、过渡的社会阶层而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超过以往任何社会的尖锐的阶级分化这样一些情况。

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将以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告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无阶级社会的建立。有许多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可以期待无阶级社会的到来。首先,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将导致日益庞大的工人阶级的产生,由此不太可能再出现新的社会分化。其次,工人所从事的革命斗争本身造成了工人的相互合作并产生了彼此间的兄弟情谊,在革命运动中产生的道德和社会学说又加强了这种感情。这种道德和社会的学说被马克思本人所采纳。第三,资本主义为无阶级社会准备了物质和文化的前提——通过大生产准备了物质条件,这种大生产使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要成为可能,并消除了为生存而斗争所遇到的障碍,并通过战胜“愚昧的乡村生活”(idiocy of rural life),提高文化水平、传播科学知识,引导人民群众参加政治生活准备了文化条件。

马克思的理论是当时社会科学中最为全面系统的理论。追溯以往,人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这一理论在过去百年当中竟然统治了社会思想领域并对工人运动的成长壮大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该理论大胆推广的勇气,以及自称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的革命学说竟会招致如此众多的反驳也是不足为奇的。

对这一理论的批评是形形色色的。有人用较为温和的字眼批评以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是一种单一因果的理论,认为它无法正确解释历史变迁的复杂性。莫斯卡和帕雷多所采取的是这种态度。但他们在辩论过程中不合理地扩大了马克思理论的外延。马克思并没有说一切社会和文化的变化都能够用经济因素来解释。他所寻求建立的是这样的观点,即大致存在于欧洲文

明范围之内的主要的社会形态的特征可以由与其相应的经济制度来表述,以及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社会变更可以在经济活动的变化中找到最好的注解,这种经济活动的变化导致了具有新的利益的新的社会集团的产生。对马克思理论的另一较为严厉的批判是,一种或多种主要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是由非经济因素的活动所造成。这就是诸如熊彼特这样的人在发现难以用经济因素解释欧洲封建主义的兴起,并注意到社会制度在自己变化了的的经济背景下仍维持其旧有形态的趋势时所表现出的理论倾向:“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以及社会观念就像无法轻易熔化的硬币。它们一经产生便会继续生存下去,也许要延续几个世纪。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表现出这种生存能力的不同的水平,因而如果从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进行推论的话,我们多半会发现,相应的集团和民族的实际行为方式总是或多或少地偏离我们预期的轨道。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当一个生命力极强的社会结构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时,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是六至七世纪出现于法兰克(Franks)王国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形式。这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它造就了延续多年的社会结构,并且影响了包括需求和技术在内的生产条件。但是最简单的解释存在于军事领导集团的作用之中。这个领导集团是由在对新的疆域进行了最后征服之后成为封建领主并仍保留着军事权威的家族和个人组成的。”^① 封建社会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出现,的确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因为尽管这些社会可以被视为在业已形成的土地社会中军事酋长制的传统和大规模的领主制相结合的直接产物(因而不能完全

^① J.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第12-13页。

排除在对历史的经济解释的范畴之外),但是它们主要是作为随着中央帝国的分裂而产生的政治产物出现的。

在这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破坏性更大的批判是对于用经济因素解释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表示怀疑的观点,即对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的解释表示怀疑的观点。马克思本人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并认为这种解释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这类批判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观点。他试图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经济变化和马克思所假设的新阶级的形成之外,还要求伴有新教所带来的人们对于工作和财富积累的观念的根本改变。韦伯在其观点中列入了许多限定条件——包括承认新教理论已基本为那些已在从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的社会集团所接受——但是就其否认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仅仅是或主要是由经济因素所导致的观点而言,其目的依然是反驳马克思的观点。不过韦伯自己的论点是否就无懈可击呢?它在不同的方面也遭到了批评:他在介绍新教伦理时对其历史的勾勒是模糊不清的,在解释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二者间的联系时也含糊其辞,而且最根本的是,韦伯的理论未能就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独立的解释。要做到这一点,韦伯将不得不证明:不仅新教伦理是新的经济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任何其他的产生于资产阶级范围内的思想都无法起到相同的作用,并且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历史事件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比马克思的理论还要过分地强调意识形态在加速和延缓社会变革方面的重要性(尽管马克思认为功利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近年来韦伯的观点日益受到冷落。今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因为我们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迅速发展的意识形态所取得的成就,在另一方

面，我们也看到在诸如印度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中传统信条所具有的消极影响。

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概念的价值取决于他的总的社会理论究竟是否正确。如果这一理论并非是普遍有效的，那么人们会认为统治阶级是从军事力量中产生的，或者在当代情况下，是从政党的权力中产生的，就像是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中产生一样。人们还可以认为，统治阶级的巩固有赖于各种类型的力量的集中——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政治的——并且事实上，在大多数社会中，这个阶级的形成始于获得经济力量之时。不过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更加基本的与统治阶级的概念有关的问题。是否在除了最简单、最原始的社会之外的一切社会中都发生了这种力量集中的情形并导致了统治阶级的形成呢？人们可以马上回答的是不同的社会形态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马克思所建立的明确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模式。也许最恰当的例子是欧洲封建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牢牢掌握着土地所有权、军事力量、政治权力，并得到强大的教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的军事阶级^①的统治为特征的。但是即使在这里，仍然要有一些标准。关于牢固的统治阶级的概念与政治力量的离心倾向是相互矛盾的，而这种离心倾向又是封建社会^②的主要特征，并且到了上述离心倾向得到完全克服的阶段——君主专制阶段——欧洲诸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不再为军事贵族所统治。尽管如此，古代社会中的贵族的确近乎理想的统治阶级的类型。

另一个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符合马克思的模式例子是早期

^① 见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著《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第二卷，第三分册，第一章。

^② 同上。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的发展可以在经济变化中找到详尽的解释。随着在经济领域中的崛起,资产阶级获得了在社会其他一些领域中的权力和特权地位,包括政治、行政管理、武装力量和教育制度等领域。这种在社会不同的领域中取得的胜利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且不同的欧洲国家还具有各自的特点。马克思的模式是对复杂的历史现实加以抽象,概括了法国革命——一个新兴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的激烈的表达方式——和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所得出的结果。尽管如此,许多史实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的论点:在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Act)赋予资产阶级以政治权力,并使立法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虽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未改变议会或内阁^①的社会构成;1855年之后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改革为中产阶级中的实力人物进入最高行政机构^②开辟了道路;公立学校的发展也为新富的工商家庭的子弟有机会深造以跻身精英行列创造了条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还从政治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哲学家那里得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有力支持。

然而,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像封建贵族那样团结紧密。实际上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人,因而在(如马克思所说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不同的集团之间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此外,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更为

^① 见哥茨曼(W. J. Guttsman)《英国政治精英》(*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第三章:“变化中的英国政治精英的社会结构:1866-1955”。

^② 见金斯利(J. Donald Kingsley)的《官僚政治的代表》(*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特别是第三章:“中产阶级的变革:财阀统治的胜利”。金斯利的结论是:“到1870年,中产阶级几乎已从所有的方面摧毁了旧政权。在下院中,富商大贾、银行家、工业家正把地主们赶走,并打算在不久之后接替他们在内阁中的位置。在文官机构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更多的位置也不再仅仅为贵族势力所把持了。现在获得这种位置的关键是必须先接受交替教育……这给这种新型制度添上了财阀统治的色彩。”(第76页)

开放,也更加灵活,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随着人文、教育等职业的发展,冲突理论也随之产生。马克思认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表面化,并且日益艰难。但这种情况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发生:不同的权力领域的分野变得更加明显,各种力量的来源也日益多样化;马克思理论中“两大阶级”的对立已经被新的中间阶级的成长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职业和不同的社会地位所造成的复杂性淡化了;政治统治也变得更加温和以及更少强迫性。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普选权的产生。普选权在原则上将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利区别开来。马克思本人认为普选权是革命性的一步,并将把政治权力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①因此,虽然在封建社会中,或者在有产者的政治权利非常有限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和政治力量很容易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二者的结合却难以产生,并且那种关于一个独特的确实的统治阶级的概念则变得模糊不清。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信徒们在试图全盘保留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时不得不承认即使在政治民主的国家中,资产阶级也总是通过其财富的间接影响进行有效统治的。这的确是不言而喻的。

简言之,上述这些便是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观点所遇到

^① 卡尔·马克思:《宪章派》,引自1852年8月25日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现在我们来看看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阶级中一股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为之斗争的六点宪章所要的不过是普选权,以及诸如无记名投票、成员交纳费用和年度普选这样一些如果或缺就会使工人阶级参加选举变成空话的条件。但是对于英格兰的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在英国无产阶级已经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长期的、未公开的内战中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位。在那里,即使是在乡村也不再存在农民的存在,人们只知道有地主,工业资本家(昔日的农夫)和雇佣劳动者。因此,如果在英国实现了普选,这将是胜过欧洲大陆上一切标有社会主义头衔的行动的社会主义之举,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最高地位。”

的一些主要困难。该观点的价值在于其试图一丝不苟地分析政治力量的来源,并能解释政权的重大更迭。借助这一观点,马克思成功地以一种更为确实的形式表达出一个在大众思想和社会理论中经常出现的概念:即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主要结构是人们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进行统治和剥削的集团,另一方面是从属的、被剥削的集团^①;他也成功地以高度概括的方法将迄今为止各不相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联系在一起,从而为这种划分的依据提供了解释;而且他还成功地通过阶级的兴衰解释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统治精英”或“政治阶级”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选择,以证明无阶级社会是无法产生的,同时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理论上的难题。统治精英的概念还特别避免了在说明由经济地位所决定的特定的阶级确实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时所遇到的困难。但是这一点只有在这一概念放弃任何解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象的企图之后才能达到。根据莫斯卡和帕雷多的理论,统治精英是由占据了社会中业经承认的政治权力地位的人所组成的。因此当我们问及在某一特定社会中谁拥有权力时,答案是:当然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这就是说,是那些占据了特殊位置的人。这似乎让人感到有些不得要领,它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特定的个人是怎样占据权力地位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会把人引入歧途,如果那些看起来在政府系统中拥有权力的人实际上是听命于该系统之外另外一些人或集团的话。这个系统精英的观点也未能对关于政治变化的解释有何裨益。帕雷多关于精英流动的理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考察——是建立在关于心理特征在人口中的

^① 参较沃索夫斯基(Stanislaw Ossowski)所著《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第二章。

分布这一理论的基础上的。这些推断造成了许多麻烦，而且在帕雷多本人的著作中也没有得到验证。另一方面，莫斯卡在考虑政治变化问题时不得不引入“社会力量”的概念（即社会中的重要利益），并将其作为新的精英的来源。正如迈泽尔所评论的那样，这一概念使得莫斯卡“很不情愿地挨近了马克思”。^①

统治精英这一概念所遇到的麻烦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显示得最为清楚。已故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著的《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这本书一方面带有马克思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莫斯卡和帕雷多的影响。米尔斯解释了为什么他宁愿使用“权力精英”一词而不采用“统治阶级”。他说：“‘统治阶级’是个拼凑不当的词。‘阶级’是个经济字眼；‘统治’是个政治字眼。这样‘经济阶级’一词就包含了一个经济阶级进行政治领导这样一种理论。这种不够严谨的理论有时可能是正确的，有时又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打算在用来阐明问题的术语中加进这一过于简单的理论；我们希望使用词义更为准确、更为单一的术语来清晰地表述理论。特别是‘统治阶级’这一词组就其通用的政治内涵来说并未给予政治阶层及其代理人以足够的活动余地，而且根本就没有提到军事力量的作用……我们认为：必须给这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以更加详尽的解释，必须加上‘政治决定论’和‘军事决定论’的内容；上述三个领域中的高级领导人如今已各自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往往只有通过复杂的彼此结合的方式，上述三者才能作出并执行重大的决策。”^②

米尔斯几乎是采用与帕雷多解释“统治精英”相同的办法来解释他的权力精英的，他说：“我们可以用权力手段这样的字眼

① 见前引迈泽尔书。

② 同上，第277页。

将权力精英解释为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人。”^①但是出自这个定义的分析仍有其不足之处。首先,米尔斯的确划分出美国的三种主要的精英——公司领导、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继而他不得不考察这三个集团是否形成一个单一的权力精英体系,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究竟是何种因素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对于上述问题的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三个集团的确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精英体系,因为它们都是上层阶级的代表,而该阶级最终总是被当作统治阶级看待的。然而虽然米尔斯强调这些精英中的大部分成员事实上来自被社会所承认的上层阶级,但他最初曾表示要将该阶级是否通过精英进行统治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而当他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时,他仅仅是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统治阶级的观点,就像我们在上面那段短暂的行文中所读到的那样。简言之,这一问题从未认真讨论过,无论在米尔斯所考察的特殊的例子方面,还是在他所表达的观点方面,他都莫名其妙地碰了壁。他曾经驳斥过关于公众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对权力精英加以控制的观点,他还强调了精英的统一性,就像其来自同一社会根源一样,——所有这些观点都恰好加强了关于统治阶级的观点。事实上他的论证过程是含混不清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这只不过是“通常很难碰到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三者合而为一的巧合现象”,一种他认为多半是由美国所卷入的国际冲突的压力所导致的巧合现象。

在对莫斯卡和帕雷多的批评中经常可以遇到上述这类问题。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认为所有的精英理论中一个最成问题的部分是关于当权者必定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集团的推断:“在民主国家中占多数的人的构成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些在政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的人无法组成一个统

^① 见前引迈泽尔书,第23页。

一的集团。”^① 这一关于当代民主国家中的精英的观点被广泛接受。在最近一项对英国社会中的上层所进行的研究的结论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大胆的阐发：“……统治者根本不是密切相关或团结一致的。他们并不像在封闭的系统中那样处于某个太阳系的中心，每一个人都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自己的职业或特长预先占据某个位置，并仅仅在某一个方面与其他人有所接触……他们没有组成一个单一的组织，而是形成了一个圆环状态，彼此间仅有微弱的联系。不同集团间的摩擦与平衡是民主最好的保障。没有哪一个人处于中心位置，因为根本就没有中心。”^②

米尔斯驳斥了这一流行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说。他总结道：“远非万能的精英彼此间的联系相当松散，因而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缺乏任何内聚力……那些占据了权力位置的人受到了来自其他精英人物的压力，或者遇到作为选民的公众和宪法条款的挑战，因此尽管可能存在着上层阶级，但并不存在什么统治阶级；尽管存在着当权者，但并不存在权力精英；尽管存在着分层系统，但并不存在有效的顶层。”^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坚持认为三种主要的精英人物——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集团。他通过论述其社会来源的相似性、不同精英的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三个领域中成员间经常交流的情形来证明他自己的观点。但由于他否认关于这个集团就是统治阶级的结论，因此他无法为权力精英的团结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除此之外，由于排除了关于统治阶级

① 弗里德里克：《普通人的新形象》（*The New Image of the Common Man*），第 259-260 页。

② 安东尼·萨姆森（Anthony Sampson）：《对英国的分析》（*Anatomy of Britain*），第 624 页。

③ 同上，第 16-17 页。

的观点,他也就排除了阶级对立的观点;因而他对美国社会得出了极为悲观的结论。他的著作中真正的主题是:第一,许多较少的、独立存在的集团对政治决策具有影响的社会将过渡到由权力精英决定所有重大问题并通过吹捧、欺骗和提供种种娱乐设施使公众保持沉默的社会;第二,由于权力精英在决策时无须对任何有组织的公众负责,由于唯利是图已成为首要目标,权力精英本身将产生腐败现象。米尔斯对历史变迁的描述的确揭示了当代政治的一些重要方面,例如日益增加的军事将领对政治的影响,但他的笔调是悲观的,因为他未能为他所描述和谴责的现实找到出路。像帕雷多和莫斯卡一样,米尔斯仿佛在说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幻想地看待当代社会,我们将会发现无论其宪法具有多少民主色彩,它们实际上仍是由一位精英人物所统治的;另外,他仿佛在悲观地向我们补充说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地理位置极为优越的社会中——没有封建等级制度,公民间经济和社会状况相当平等,加上强烈的民主意识——历史进程中还是产生了拥有无法解释的、空前的权力的统治精英。米尔斯与其他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这种情形加以指责,而后者对此则要么赞赏,要么无动于衷地予以默认。

“统治阶级”和“统治精英”的概念是用以描述并解释政治事件的,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为解决产生于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和合理的答案。社会统治者是否建立起一个社会集团?这个集团是团结的还是分裂的?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该集团的成员是如何挑选的?其权力的基础是什么?这种权力是不受限制的还是受到其他社会集团力量的制约?不同的社会在上述方面是否存在着重要的系统的差别?如果存在着这类差别,又该如何对此加以解释?

这两种概念在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是社会结

构^①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方面是彼此相似的。但它们又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这种区别：“统治精英”概念是用有组织的，进行统治少数人同无组织的多数人，或曰大众，进行对照的，而“统治阶级”概念则是拿可以组织起来或可能建立组织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进行比较。从这些不同的观点中又派生出表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不同方式。在采用统治阶级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阶级冲突变成了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但是精英理论却认为。——尽管帕雷多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并且认为该观点具有“深刻的真实性”^②——有组织的少数人和无组织的多数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多的被动性，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如何解释统治精英的兴衰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真正提出的话——就不得不靠精英是周期性衰微的假设（帕雷多），或者靠关于群众中新“社会力量”的崛起这样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的观点（莫斯卡）去解答。

这两种概念的另一个区别是它们对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的内部团结的程度作了不同的解释。由占据了社会中领导地位的人所组成的“统治精英”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内部团结的集团，除非考虑到其他一些情况，例如他们有的来自有产阶级，有的则具有贵族血统（就像莫斯卡不断指出而且帕雷多间或也提到的那样）。但是作为拥有社会中主要的物质生产工具的“统治阶级”却被视为一个团结紧密的社会集团；首先，由于其成员具有明确的、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集团始终处于同社会中其他阶级相互冲突的状态，因此在这种冲突中统治阶级

^① “从科学研究的观点看来，统治阶级、或政治阶级（照我们的说法是‘政治精英’）的概念最宝贵的价值存在于下列的事实之中：统治阶级的不同结构对于决定不同民族的政治类型，以及文明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见前引莫斯卡书，第51页。

^② 帕雷多：《社会主义制度》，第二部，第405页。

的自我意识和内部团结不断得到加强。另外这一概念还明确指出,少数人统治地位的基础即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而“统治精英”概念却很少提及精英所拥有的权力的基础,除非是当它吸收来自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的某些成分的时候。米尔斯在研究“权力精英”时,曾试图分别解释三种主要精英的实权地位——经济巨头主要靠公司业务的发展壮大取得了实力地位,军事将领的实力地位来自技术和国际冲突所决定的军事武器的发展,而国内政治领袖则是通过一种差强人意的的方式,靠立法机构、地方政治和各种民间团体力量的削弱来加强实力地位的——但是权力精英作为单一集团的团结,及其权力的基础等问题却未得到解释。为什么权力精英只是一种而不是三种?

“统治阶级”这一概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具有更大的创造性和启发性,在于它对创建理论所具有的价值。然而我在此之前已经指出了这一概念的某些不足之处,现在有必要考虑是否能够克服这些缺陷。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步骤将是放弃认为可以用该概念描述在所有社会中都会以一种一般的形式出现的真实现象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仅仅把它当作一种马克斯·韦伯所形容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①如果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这一概念,我们便可继而探询某一特定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理想的类型之间有多少相同之处;这样就能够将这一概念作为思维和调查的工具正确地加以使用。这时才有可能清楚地看到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来源于对某一特定历

^① 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将历史生活中的某些关系和事件集合成一个复合体,它被当作是一种内在的持久的体系……这种复合的建立本身就像是乌托邦,是通过明确强调现实中的某些因素的完成的……它不是前提,但却为前提指明了道路。这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却意在给这种描述提供准确表达的方式……一种理想类型是通过片面强调一种或几种观点,通过综合数量众多、零零碎碎、到处存在着的、具体的并且是独立的现象而形成的。”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90页。

史阶段——封建社会末期和近代资本主义初期^①——的研究，并且有可能考察作为阶级尚未形成或仅具有雏形的结果的其他历史时期在哪些方面偏离这个理想类型，并且偏离得多远，以及在阶级形成过程中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因素的影响和不同形式的权力之间的冲突。

有两种与众不同的社会环境，从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偏离统治阶级的理想类型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虽然存在着一个“上层阶级”——即特殊的、拥有大量社会财富并获得数量上大得多的、不成比例的国民收入的社会集团，该集团在上述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特殊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轻而易举地维护其财产权利并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的意义上说，该阶级并不享有无可争议或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情况已被许多观察家，特别是来自当代民主国家中的观察家所察觉。正如我曾经提到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由少数人组成的上层阶级对财富和生产资源所拥有的权利同广大群众通过选举权所获得的政治权力之间潜在的对立。正像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曾经提到的那样：“Il est contradictoire que le peuple soit à la fois misérable et souverain.”(作为主人的人民大众却在受苦受难，这种情况是矛盾的。)

为判定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着“统治阶级”，有必要首先考察上层阶级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一方面，我们将会注意到本世纪许多民主国家都对私有财产的使用施加了种种限制，并且作为累进税，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现

^① 正如克罗齐(B. Croce)在评论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时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出自解释某一确定的社会现象的需要，而不是来自抽象考察历史生活诸因素的需要。”克罗齐：《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第17页。

象已有所改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上层阶级所拥有的私有财产份额下降的速度是异常缓慢的,并且通过税收所进行的再分配也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果。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① 经过周密考察英国的情况得出结论说:“到1939年为止,无论是通过工会的压力抑或预算的改变,在使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朝着有利于公众的方向改变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雇佣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大体上是同步的,他们收入的份额似乎仍是一个常数……主要的分配情况是……在所讨论的这一时期的结尾(1939年)就像这一时期的开头(1911年)一样,大约百分之十的人口仍获得了几乎半数的国民收入,而另外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只得到国民收入的另一半。”^② 在其后的期间,直到1951年,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其结果是大约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从有产者转移到了雇佣劳动者手中,然而这一趋势在1951年之后似乎又发生了逆转。^③斯特雷奇的结论是:“所有这一切证明资

^① 斯特雷奇:《当代资本主义》(*Contemporary Capitalism*),第八章:“真正的发展”。斯特雷奇吸收了其他一些研究成果,包括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的《社会主义状况》(*The Socialist Case*)以及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的《1938年以来的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是否变得更加不平等了》(*The Levelling of Incomes since 1938 and Ha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come Become More Unequal*)。

^② 同上,第137-138页。

^③ 同上,第146页。就在不久以前,梯特姆斯(Richard·M·Titmuss)在他的《收入分配与社会变迁》(*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中对有关英国收入分配的材料来源作了迄今最为详尽的研究。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调查从事国民收入课题的学生们所使用的数据的准确性,这些数据一般都来自国内岁入委员会(The Board of Inland Revenue)的研究报告;他详细证明对于准确判定一定时期收入分配情况或者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来说这些数据是如何缺乏可靠性。尽管如此,他认为应该注意到那些特别是在估计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收入所需要的附加因素——人身保险、退休金中免税的部分、教育订约金、抚养委托金、支出帐单,以及资本所得——都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而且一项对上述费用的数量的研究表明,从1938年以来,任何旨在扩大收入和财富的平等的行动,归根结底其范围都是非常有限的。梯特姆斯本人的结论是:“……我们更加难以相信自1938年以来任何在英国发挥

本主义实际上具有两极分化和加剧不平等的内在倾向。不然的话大众在过去百年间成功采用的不断增加的平均主义措施怎么会仅仅得到维持原有水平的结果呢？如果这一制度的运转不是不断得到修正的话，不早就出现马克思认为是资本主义基本趋势的更加尖锐的两极分化了吗？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①很显然，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英国的上层阶级已经相当成功地抵御了向其经济利益发起的种种挑战，因为该阶级具有捍卫其作为统治阶级在本世纪所维持的自身利益的力量。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外的其他民主国家中的情况与英国的情况大同小异；在上述所有国家中，右翼政府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而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情况即使有所变化，也是进展缓慢的。因此人们一定会怀疑这样的观点：只要将选举权扩大到人民大众便能立即建立，或者在现代民主国家还存在着短时期内建立人民的统治，并消灭统治阶级的权力。看来迄今为止在民主国家所发生的不过是统治阶级权力的削弱和工人阶级激进主义情绪的缓和罢了。

第二种偏离“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模式的情况是：领导集团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一个例子是，在下列的社会中，知识阶层或官僚阶层拥有最高权力——在中国是由士(literati)领

作用的平等化力量是否被提到‘自然法’的地位并在未来产生效果。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常常有一些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结构中并为许多来自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复杂的因素所推动的力量在起着相反的作用，其中某些与权力分配密切相关，并且有长远影响的关键性力量——例如在财产授理和委托金方面的情形——却在暗中起着扩大不平等的作用。目前的收入统计并未将它们计算在内，仅仅是财产统计方面才略有涉及。即使如此，一些研究结果已明确指出，自1949年以来，收入的不平等情况一直在发展，而在英国比在美国要集中得多的财产的所有权现象多半变得更加不平等；此外在大家族对财富的拥有方面的不平等情况近年来显得格外惊人。”(第198页)

^① 同上，第150-151页。

导,在印度是由婆罗门统治。在当今共产党国家中还可找到另外的例子。在那里权力集中在政党领导人手中。不过在这些情况中,我们必须仔细考察领导层同领导阶级的区别究竟明显到什么程度。在印度,在婆罗门势力最强大的时期,他们实质上也是土地的所有者,并且在印度历史上的帝国时期和封建时期,他们同拥有土地的武士种姓结成了紧密的联盟。有时他们自己还建立统治或贵族院。看起来在婆罗门和武士种姓的个人与家庭之间曾经发生过相互融合的情况,而这一点在叙述种姓排他主义理论的传统教科书中则只字未提。

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士主要来自地主家庭,有时则来自富家豪门^①,因此他们总是与上层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此之外,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还注意到另一个与这些知识分子和管理者集团的统治有关的经济现象。^② 在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古代社会)^③中,主要的生产工具之一是水利系统,而士和婆罗门虽然并不拥有这一农业生产赖以发展的工具,但却或多或少的控制了水利的使用。结果除了对土地的所有权外,他们还拥有这一至关重要的经济力量。魏特夫认为这为他们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主要的支持。

然而,尽管领导层具有上述有利条件,它和权力直接建立在拥有对私有财产的合法权利这一基础上的统治阶级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拥有行政手段也就等于间接地拥有了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和经济生产的手段。^④ 这种

①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第71页。

② 同上。

③ 见斯图尔特(Julian H. Steward et al),《水利文明:一种比较研究》(*Irrigation Civiliz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④ 艾森施塔特(S. N. Eisenstadt)在一项最近的研究《帝国的政治制度》(*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中对官僚社会的特点进行了考察。

区别也许在当今的共产主义国家中显得更加突出。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着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但经济是由执政党和国家的官员所控制的。魏特夫曾试图巧妙地将这种类型的政治权力和一般类型的“东方专制主义”^①等同起来，但我认为二者间的鸿沟实在是太大了——一方面是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私有制的存在，以及官僚同有产阶级之间紧密无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由政党进行特殊的统治^②——因此这种尝试很难获得成功。在我看来，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制度更加接近纯粹的“权力精英”的类型，却更像由于得到某些阶级支持或默许而登上权力舞台的集团，而对一盘散沙般的大众，该集团主要依靠自己组织严密的少数的优势来维持权力地位。不过在当代中国和印度，我们所碰到的是一种将统治阶级的特点同权力精英结合在一起的制度。

在关于统治阶级的地位问题上还有一种情况，虽然已被提及但仍需深入考察，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是否存在是大可怀疑的。由于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其财产所有权，且这种财产很容易为后代所承袭，这样该阶级就具有了一种持久性的特征。这个阶级是由一些通过财产继承从而世代代都作为该阶级成员的家族所组成的。这种组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新的家族会加入进来，而一些老的家族可能会衰落，但其中大部份成员则是世袭的。只有当整个生产体系和财产所有权发生剧烈变化时，统治阶级的构成才会发生重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一个统治阶级已经为另一个所取代。然而，如果我们在某一特定的社会或社会类型中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与家族的地位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范围广泛的变化，以至于

^①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第71页。

^② 本书后面章节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

没有什么家族可以凭借雄厚的经济与政治实力长期保持地位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是无法存在统治阶级的。实际上正是这种“精英的流动”(按照精英理论家的措词),或曰“社会流动”(根据最新的社会学研究的说法)被一些学者作为当代工业社会的第二特征加以确定——第一个特征是普选权——这一特征即使没有完全排除也是严格限制了关于在这些社会中存在着统治阶级的设想。这样我们便得到曼海姆等人的观点^①,即可以把工业社会的发展准确地描绘成从阶级形式向精英形式的过渡,从建立在财产继承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向另一种建立在才能和成就基础上的制度的过渡。

我认为“统治阶级”和“政治精英”两种概念之间的对立表明它们一方面是截然相反的,就像纯粹政治生活、特别是未来的政治组织发展的可能性的各种理论是如此大相径庭一样,而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彼此相辅相成的观点,它们涉及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或是同一政治制度的不同侧面。借助了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尝试区别下面几种社会的特点:统治阶级同代表该阶级某些特殊利益的精英并存的社会;不存在统治阶级,但存在着将其权力建立在对行政的控制或者军事力量,而非财产所有权或继承权的基础上的政治精英的社会;以及各种精英并存,但没有哪一个强大的个人或家族的集团能够长久维持其地位的社会。为了能够清楚地分类,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考察——正如我在后面章节中所要做的那样——精英的流动、精英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新的精英和新的阶级形成的方式。

^① 见《人与社会》(*Man and Society*),第二部分,第二章。

第三章 政治与精英的流动

“历史是智者的墓场”。帕雷多用这一隽语表达了他政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精英的流动”(circulation of elites)。但在帕雷多的主要作品中，他对上述现象的分析远不如他的文笔之具魅力和吸引人。

这里我们将遇到两个主要困难。首先，“精英的流动”是指个人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流动的过程呢，还是指某一个精英人物被取代的过程？在帕雷多的著作中，上述两种概念兼而有之，尽管前一种占据了主要地位。例如，当他讨论贵族的兴衰时，他注意到“统治阶级的更换不仅是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这一过程是由来自下层阶级的家族完成的……”^①帕雷多用类似的语言再三提到这一现象——“个人在两个层次(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心智与社会》，第1427页)；“在社会上层中，第二阶级的残余逐渐衰败，直到来自较低阶层的力量将他们重新加强。”(同上)与此同时，帕雷多提到另一种对于社会平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产生于非常时期，并从中产生出执掌权力的新的精英。看来他将这种运动同第一层意义上的精英未能实现流动联系起来，但是显然他也将此归入总的精英流动的一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Les systemes

^① 《心智与社会》，第1430页。他在另一早期著作《社会主义制度》中几乎是用相同的字眼表述这一观点。(第28-30页)

socialistes)一书中,他提到“(个人的)这种流动速度的延缓将导致执政阶级蜕化速度的加快。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平衡变得岌岌可危,不堪一击。……一点微小的震荡都可能摧毁它。革命或讨伐将产生动乱,把新的精英推上权力舞台,并建立起新的平衡……”(第30页)

帕雷多的学生之一,玛丽·克拉宾斯卡在其所著的《法国精英的流动》(*La circulation des élites en France*)一书中对不同类型的精英流动作了更为明确的划分,结果就连她的老师也非常满意地对此加以引用。克拉宾斯卡划分出精英的三种流动方式。首先,统治精英内部不同类型间的流动。其次,精英同人口的其余部分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有两种形式:一、来自社会下层的人有可能成功地进入现存精英人物圈子。二、来自社会下层的人可能组成新的精英集团,该集团将为夺取权力同现存的精英展开斗争。克拉宾斯卡主要致力于研究后两种精英在十一至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中流动的状况,我在后面将对她的发现进行考察。

在帕雷多的论述中所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与他精英流动的解释有关的。在某些场合,他似乎认为精英是特定的社会利益的代表,因而把精英的流动看作是旧有利益的衰亡和新兴利益的产生的结果。因此之故,他认为“起初军事、宗教以及商业贵族和财阀——加上一些可以忽略不计的例外情况——一定组成了统治精英的一部分,有时甚至组成了统治精英的全部……”(《心智与社会》,第三部,第1430页)而在其他的场合,在讨论新的精英的崛起的时候,他又提到在英国的产业工人当中产生出一种工会精英。(《社会主义制度》,第32-33页)在这方面,克拉宾斯卡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解释,她列举了法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里精英集团的崛起:商业阶级、工业阶级、资产阶级、律师以及金融家。

显然，帕雷多倾向于通过精英成员和来自下层的人心理素质的变化来解释精英的流动；或者按照他的说法，用上述两个阶层的残余中发生的变化来加以解释。他说，贵族不单是在数量上减少：“从丧失活力的意义上讲，他们在质量上也在衰退，因此导致了能够使它们赢得并维持权力的贵族残余人数比例的下降。来自下层的家族……重新填补统治阶级中的空缺。”（《心智与社会》，第三部，第1430页）在讨论整个集团的流动时，帕雷多认为革命是在上层社会加速走向腐朽，下层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同上书，第1431页）为了对这一解释作出评价，有必要简要地考察一下帕雷多关于“残余”概念。在《心智与社会》中，他先从区别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所分别采取的逻辑性的和非逻辑性的行为入手（“合理的”及“非合理的”也许是更为恰当的字眼）：那些采用合适的手段以达到现实可行的目标是逻辑性的行动；那些毫无目的、或为虚无缥缈的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以及那些无法达到目的行动是非逻辑性的行动。帕雷多认为人类的大部分行动是非逻辑性的。^① 他继而探索非逻辑性行为背后的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及这种行为如何经常以逻辑性行为的面目出现。他在六种“残余”（residues）中发现了这些力量。他将这六种残余称之为复合性残余，聚集物的持久性残余，社会性残余，行动残余，人的完整性的残余以及性的残余。帕雷多以“衍生物”（derivations）为题讨论了由这些残余所决定的行动是怎样以逻辑性行为之面目出现的，这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有相似之处。帕雷多没有给这些残余下精确的定义，但却在描述

^① 据帕雷多的说法，逻辑性行动的主要领域是经济（或实业）和科学的领域。他夸大了这些领域（特别是前者）中行为的合理性，并且低估了社会行动的其他领域，例如政治领域中行为的合理性。

社会事件时变幻不定地加以使用。^① 在《心智与社会》一书的最后部分,他在较为系统地研究精英流动问题时,仅仅涉及了前两种残余。他认为可能有两种统治精英的管理方式:一种是狡猾的手段(来自复合性残余的特点);一种是用暴力手段(来自聚集物的持久性残余的特点)。因此第一种和第二种残余被视为两种划分一切政治态度的基础。帕雷多在关于政治生活的讨论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试图将西方社会历史中经过选择的数据纳入这一公式。这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划分,特别是考虑到他在论文之初所提出的大量观点时更是如此,何况这种划分也没有什么可靠的基础。帕雷多的这两种分别由第一和第二种残余赋予活力的精英——他也称之为“投机商”和“放高利贷者”——同马基雅维利的“狐狸”和“狮子”极为相似,但是他们披上了具有更多的科学色彩的外衣。帕雷多是否采用了更加科学的术语,这个问题留待后人去解决。因为虽然帕雷多在书中提出了大量的科学方法,但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努力通过具体的调查方法证明据说可以决定这些精英的特点的这两种人格的确存在,或用准确的心理学术语对此加以表述,或表明不存在其他的政治人格。即使断言这些人格的存在,以及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仍然有必要说明精英成员在智力、感觉、观念和情感方面的变化都各自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并且导致精英的流动。帕雷多并未作这方面的努力,而是列举历史上一些精英衰亡的例子,然后轻率地断言在他们的“残余”中发生了变化。

帕雷多的这些对精英兴衰的研究同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① 莫理斯·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后来在一篇名为《帕雷多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areto)的文章中对“残余”概念提出批评,该文明确指出帕雷多在这一问题上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捉摸不定的。参较他的《社会中的理性与非理性》(Reason and Unreason in Society)。

他未能收集足够的(即使是短期内的)例证并说明在精英的流动中有某些与情感的变化有关的规律性的东西。如果情感的变化问题可以独立地加以证明的话。他仅仅提供了主要是来自当代意大利政治和古罗马历史的图解以支持他的一般结论。

最后,帕雷多没有解决两种类型的精英流动——一个人的荣辱与沉浮,以及社会集团的兴衰——是如何相互联系的问题。简言之,他认为如果统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向来自下层的杰出人物敞开大门,则前者有可能长久维持下去,^①反之,一位精英人物被另一位精英所取代也许是个人之间流动失败的结果。因此,他宣布“革命产生于上层社会中腐败因素的增加——或是由于阶级流动过程的缓慢——因而不再存在适于维持权力的残余,同时又惧怕使用武力的过程中,与此同时,社会下层中的优秀分子正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拥有适于掌管政府并且愿意使用暴力的残余。”(《心智与社会》,第三部,第1431页)读者如果想从对革命的比较研究中,或是从对说明精英与非精英之间个人的流动程度的重大差别的不同社会体系的比较中找出支持这些论点的确凿证据,他将会大失所望。

的确,收集从事上述比较所需的材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也许有些历史上的例子马上可以用来证明帕雷多的概括是错误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印度的情形——一个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始终保持了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社会,并且就迄今为止人们所能发现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发生过下层社会中的人进入精英行列的变化;但是直到近代为止,该社会几乎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革命运动,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位精英人物被取代的情况。即使我们承认在近代西方社会中也许寻找社会流动性和革

^① 参见克拉宾斯卡该书第9页:“总的说来,吸收自身以外因素的精英分子比那些排斥这些因素的精英们处于更加稳固的地位。”

命情绪以及革命行动的优势之间的联系将会有所帮助,但我们仍然无法解释精英的兴衰是否仅仅是由于限制了个人进入精英行列的过程,因而导致的革命的或者比较缓慢的变化所造成的。有必要对某些“其他的原因”进行考察,虽然帕雷多提及了这些原因,但他并未加以研究。

玛丽·克拉宾斯卡就法国的精英所写的书意在通过更为详尽地研究某一单独社会中的流动过程证实帕雷多理论的正确性。然而事实上该书并未为历史提供比帕雷多更有说服力的经验主义的例证,因为该书采用的是同样不恰当的图解历史的方法。克拉宾斯卡从她所调查的法国历史的每一时期援引出特定的个人或家族兴衰的例子,尽管这能够表明在这些时期的法国社会中某些个人有能力改变其社会地位(谁又会对此加以怀疑呢?),可是却只字未提这种流动的程度,因而也无法使人将这种流动的大小同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联系起来。只有在她涉及她研究范围内的最后一段时期时(1715-1789),她才提供了一些与不同社会阶层在精英中的代表性有关的情况;即使如此,她所收集的材料也是相当有限的,而且这些材料一方面具有价值,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令人疑窦丛生的结果。在某一场合(第93页),她引用一项评论说,在1787年有五分之一骑兵部队高级军官不属于有爵位的贵族,而且其中有些人的姓名中连作为贵族标志的小词“de”都没有。她以此作为平头百姓正在进入军事精英行列的证据。然而就在下一章她又认为包括军事精英在内的法国精英在大革命到来之前的几年当中越来越具有排他性,并且她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话说,姓名中不带有象征贵族的小词根本不能证明某人不具有贵族血统。(第104页)人们还会注意到在《心智与社会》一书出版以前就进行了调查的克拉宾斯卡很幸运地不必考察她所追踪研究的那些人的财产同他们的“残余”之间的联系,因此她主要是用新经济利

益的发展这类字眼来解释这些情况。

另外一些作者也研究了同样的精英流动现象，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这种流动何以发生以及怎样发生的另外一些解释。莫斯卡在早期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掌握和运用政治权力的能力不再由法定的统治者所独具，而在其他人身上也显得不足为奇时；当在统治阶级之外形成了另一个阶级并发现它被剥夺了权力，尽管它的确拥有分担政府的一部分职责的能力时，——于是法律变成了某一力量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因此必须采用某种方法将其废除”（*Teorica dei governi e governo parlamentare*）。他在后期作品中又系统阐述了同一思想，*Elementi di scienza politica*：“……在下层阶级中也形成了另一个统治阶级，或曰统治的少数，并且这一新兴阶级经常与控制合法政府的阶级相对抗。”除了这种在精英和取代旧的精英的新来者之间的斗争中产生的流动形式之外，莫斯卡还承认由于来自社会下层阶级的佼佼者地位的上升而导致的现存精英的新陈代谢这样一种流动方式；他还考察了在不同的背景之下通往精英的道路的相对坎坷或平坦的状况。从这一点出发，他根据精英的开放程度来区别流动的社会与凝固的社会，作为与帕雷多的对照，他注意到，并且明显夸大了作为当代民主社会的显著特点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程度。在当代欧洲社会中，“……统治阶级的等级是开放的，阻止来自下层阶级的人上升的障碍要么已被排除，要么受到了限制，专制国家向代议制国家的发展使几乎所有政治力量及所有社会利益参与社会管理成为可能。”（《统治阶级》，第474页）

然而，从莫斯卡所寻求的解释当中可以看到他关于精英流动的最重要的观点。他时常提到精英成员的智力水平和道德修养，但是与帕雷多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过分强调这些内在素质。首先，他认为个人的这些特点常常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战斗的勇气，进攻的果敢，抵抗的顽强——长期以来上层阶级经常以此而自诩，说这是他们独具的素质。当然不同的人在这些方面存在着自然的，以及——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说的话——内在的差别。但是最重要的是传统和环境的影响使这些素质在人类任一大的集团中有高下优劣等不同水平的表现。”（同上书，第64页）其次，在他对精英兴衰的解释中他几乎只字未提这些个人素质；他是从社会中新的利益和理想的产生，就像是从新的问题产生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现象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旦政治力量的平衡发生变化——即当感觉到自己比原有精英更加卓越的人认为应该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时，当原有精英感到力不从心时，于是统治阶级得以建立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社会中一种新的财富资源得到开发，如果知识的现实重要性不断发展，如果一种旧的宗教衰亡，新的宗教诞生，如果一种新的思潮得到广泛传播，那么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具有深远意义的分崩离析必将产生。”（同上，第65页）正如迈泽尔所注意到的，这一论点使莫斯卡靠近了马克思。由于他意识到这一危险，他便千方百计试图通过坚持认为以经济观点解释历史具有局限性，或者通过强调道德和宗教思想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来区别他和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上莫斯卡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与马克斯·韦伯有些相似，在反对以绝对的、片面的经济观点解释历史的问题上，二人是相同的。但是由于他宣布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怀有敌意，因此他不愿意像韦伯那样承认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另外两位学者也都各自独立地讨论了精英流动问题，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他们的观点。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在一篇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

(*Les Périodes de Chistoire sociale du capitalisme*)^① 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论断,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显著阶段^② 都是以资本家中某一不同的阶级的统治为特征的。“随着经济发展的每一点变化,其持续性都遭到一次破坏。人们也许会说,连当时异常活跃的资本家也承认他们无力使自己适应由于无法预测的需求的产生而导致的环境变化,这种需求要求采取新的令人满意的手段。于是他们退出斗争,变成贵族。这种贵族的成员如果还算是参与任何重大事务的话,那便是以一种提供资本的被动的方式参与的。在他们原有的位置上出现了大胆创新的一代新人,他们在惊涛骇浪中扬帆远航……”皮雷纳划分出四个主要阶段,在这些阶段中都发生了下述过渡情况——自十一世纪以来城市商人的出现,十三世纪世界贸易的发展,十六世纪工业和制造业城市的涌现,以及产生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因此皮雷纳希望以此表明在每一个转折点都有新的来自社会下层的执掌经济活动牛耳的人。

熊彼特在一篇关于“相同种族环境下的社会阶级”^③ 的文章中也作了类似的考察。熊彼特在该文中明确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流动,并研究了“某一阶级中家族的兴衰”,“超越阶级界限的运动”,以及“整个阶级的兴衰”这样一些问题。熊彼特的研究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一是他兼顾了精英流动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因素。他认为,撇开机遇不谈,在各阶级间的家族兴衰过程中,社

① 见《比利时皇家学院公报》(*Bulletin de p Academie royale de Belgique*), 1914年5月号。一个与此有关的,舍弃了许多注解的英语术语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14年4月号上。

② 这并不影响我们目前的讨论,即皮雷纳发现了这种发展早期的,即十一世纪时的渊源。

③ 最早发表在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Vol. 57, 1927。其英译见约瑟夫·A·熊彼特的《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会地位的上升受到了精力充沛,才智超群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诸如上层阶级的开放,在新的领域中施展才华的机会增多这样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在整个阶级的兴衰过程中,有些影响来自个人的秉赋,但主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对精英集团的功能有作用结构性变化。“……在整个国民结构中,每一阶级的地位一方面要看人们对其所发挥作用的评价,另一方面有赖于其成功地发挥作用的程度。”熊彼特通过考察自十四世纪末起日尔曼军事贵族的兴起及其后来的衰落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过程,并将此作为国家行政体制发展和世袭土地财产的结果。在人们彼此间的征战已不再受到社会的推崇,——即社会的非军事化——以及有利于大宗地产的经济变化,我们可以找到导致这种衰落的一些重要原因。

上述研究都试图通过总结政府机构中人员的变更,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通过解释社会中特定集团的权力或影响的变化来说明政治变化的原因。这些研究在系统阐述主要问题并为其结论提供佐证方面究竟取得了多少成果?在帕雷多所采取的方法同莫斯卡、皮雷纳或熊彼特所采取的方法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帕雷多更加注重个人在精英和非精英之间流动;由于他直接选择“社会平衡”(social equilibrium)作为他考察的主题,因而得出了这一观点。像当代机能主义者一样——从意识形态和科学的意义上说他是机能主义者的开山祖师——帕雷多着手研究那些维系现存某一特定国家或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主要因素;同样,他也和他们一样不动声色地从他研究领域中排除了任何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的主要区别或对社会从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的原因的探索。在帕雷多的历史图画中不存在真正的社会结构的过渡,只有无穷无尽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由于来自下层的新的因素给正在走向衰亡的精英注入新的活力,或者相同的因素在作为个人建立新的精英队伍的愿望遭到拒绝

之后，起来推翻原有的精英，并取而代之。尽管发生了这一变化，社会形态却依然故我，因为社会的抽象定义是精英对多数人的统治。如果从帕雷多的立场出发，探询精英的组成或其文化外貌，或精英与群众的关系方面是否随着历史而发生变化，那是毫无意义的。每当帕雷多涉及到这类问题时，他都会退避三舍，并一再强调他研究的主题是一般的、抽象的，是解决关于社会平衡的条件这样的历史问题的。

在另一方面，虽然莫斯卡，皮雷纳和熊彼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承认作为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社会中将会产生新的社会集团，承认当该集团所从事的活动对全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时，这些集团的社会影响将会大大加强，以及这些活动将使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他们注重社会集团，特别是那些以经济作用为显著标志的集团的兴衰。这说明了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影响。他们描述这些集团时使用“阶级”而不是“精英”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该理论的影响，这样他们提出一种社会模式，其中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和历史多样性比一位统治精英和群众之间普遍的、一成不变的鸿沟更加引人注目。只有在莫斯卡的作品中，后一种区别才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正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每当他讨论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时，他便将该种区别彻底束之高阁。这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学者在考虑社会集团的变动时都完全否认个人在精英集团（或上层阶级）与社会下层间的流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熊彼特就非常仔细地划分了流动的不同形式，莫斯卡或多或少也做到了这一点；只有皮雷纳在研究中将注意力局限于新阶级的形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帕雷多也是大相径庭的，因为（熊彼特的著作表达的最为清楚）他们基本上是用阶级结构本身的特点，而不是个人能力和特征上的差异，来解释各阶级间个人和家族的流动的。

这一精英流动概念的最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的来源我已提及——是它从精英的本质出发,涉及至少在西方文明范围之内历史的真正发展过程,涉及精英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并承认技术和一般文化的变更产生了不同形式的阶级结构和政治权力。

但是虽然在莫斯卡、皮雷纳和熊彼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比帕雷多更加前后一致、更加雄辩的对精英流动的解释,然而这些研究在很多方面仍有不足之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缺乏恰当的调查方法。这些研究都没有设法证明在个人和集团流动的程度和经济、政治及文化系统的变化之间是否始终存在着联系:首先,这些研究没有提供不同社会间的系统的比较;其次,这些研究没有对其讨论的诸现象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帕雷多、莫斯卡、克拉宾斯卡、皮雷纳以及熊彼特都成功地证明某些个人改变了其阶级属性,或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进行了流动。他们主要是通过列举在社会等级中得以升迁的个人的例子做到这一点的。但这并未提供我们渴望知道的东西,即来自社会下层的人进入精英或上层社会的比例是多少,以及下层社会中能够升迁的人的比例是多少。看来这种图解历史的方法所导致的结果是夸大了社会中精英流动的程度。例如,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注意到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历史上最近某一时期的某方面精英的更替情况时便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工商领袖人数的比例。“实际上旨在建立这一(实业界精英新陈代谢的)模式的所有概括都是建立在来自‘强盗大王’(robber baron)时期的极少数特殊人物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读一读工商巨头们的传记,人们几乎找不到有哪一位是出身工人阶级或具有外国血统的。在这些巨头中间甚至

也见不到出身微寒、目不识丁的农夫的儿子。”^①显然，精确统计个人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已成为当代社会学称之为“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的研究的组成部分]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即使统计当今社会中的有关情况亦是如此。在最近一项在比较的基础上研究社会流动性的尝试中我们可以发现上面所提到的某些困难^②：撇开那些计算方面的一般问题不谈，这里还存在着不同社会中精英集团的规模这样一些特殊的问题，以及不同社会中阶级结构的差别这样的问题，这些不同社会中从事农业、工业、手工业或非手工职业的人口比例是大不相同的。

从上述问题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像帕雷多那样简单地划分精英与非精英是不恰当的，因为计算人口的其他部分流向精英的比率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除非我们知道某一社会中精英和一般阶级结构的大小。然而，在研究当今社会精英流动问题时，至少有可能通过国家的抽样调查，或是通过对某一精英集团的更为详尽的研究获得必要的的数据资料。当我们研究历史上的精英流动情况时，收集数据本身就是一个难题，不过早期的学者们没有认真地加以对待。毫无疑问，目前缺乏资料的状况，部分地是由于一般历史学家对这种数量调查不感兴趣，以及带有这些问题的社会历史仍在继续发展这些情况所造成的。正像威廉·米勒在我所引用过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可能会认为，大量占有了统治阶级活动资料的历史学家将会率先系统地研究精英的补充和精英的周期问题。在美国这种没有正式的种

^① 见威廉·米勒所编的《实业界人士》(*Men in Business*)中的“美国历史学家与商业精英”。一项对精英流动的比较研究肯定了这一观点。该项研究的结论是：在能够提供数据的十四个国家当中没有任何国家发生过从手工劳动阶层向上层升迁的情况。见米勒(S. M. Miller)《当代社会学》(*Current Sociology*)，第九卷中“社会流动性之比较”，1960年。

^② 同上。

姓制度以及依照法律建立的世袭的等级制度的国家里,这一问题显得特别有趣。然而大多数美国历史学家都回避了这一问题。”^① 米勒所编辑的研究工商业精英的著作,最近一项对中国的“士”的研究^②,以及一些对各国政治精英的研究^③,都表明必要的历史资料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能被发现的,但是对许多国家和历史时期来说,人们依然无法判断并计算精英流动的程度。

即使能够在大多数社会中找到比较准确的精英流动的资料,为了揭示这种流动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仍然有必要采取以往任何学者都未尝试过的步骤,即对不同的社会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比较。帕雷多认为个人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流动是始终如一的、规律性的现象。但这种观点对吗?不同的社会在流动的速度上不是存在实质性差别吗?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话,对这些差别该作何解释,它们在政治领域中的效果又如何呢?莫斯卡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精英流动的速度是很快的,按照他的话说:“当代的代议制国家使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及社会价值参与社会管理成为可能。”我刚刚提到过的上述调查并未肯定上述观点,不过当代工业社会中的流动性仍有可能比多数其他社会要大得多。我们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与个人的流动同精英或阶段的兴衰之间的关系有关。是否如帕雷多所说的那样,当个人流动的速度过于缓慢时革命便会发生?这些问题说明有些问题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的确无法解决。这些难题早期的学者们仅仅是提出而已,尽管他们在解释性的声明

① 同上,第309页。

② 马什(Robert M. Marsh)《士大夫:1600-1900年间中国的精英流动》(*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 in China 1600-1900*)。

③ 请特别参较哥茨曼(W. L. Guttsman)的《英国政治精英》(*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以及杜文·马维克(Dwain Marvick)主编的《政治决策者》(*Political Decision-Makers*)中马提·多根(Mattei Dogan)对法国代理人所作的研究。

中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帕雷多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在精英流动过程中的活动这一点上。在我看来，其他以大量篇幅考察集团的活动——精英的兴衰——的学者并没有超过马克思在解释社会阶级的超源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事实上，他们都相当重视新的社会利益的出现的重大意义。莫斯卡的“社会力量”同马克思的“阶级利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皮雷纳整个考虑的是新的资本家集团的兴起，而熊彼特则用大量经济名词解释军事贵族的衰落。他们与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了在主要的社会阶级中亚集团——例如新的职业集团——的发展，在于他们拒绝承认马克思在近代资本主义中所预见到的潜在的无阶级社会。莫斯卡虽然强烈坚持文化和宗教因素对新的“社会力量”产生的影响，但却没有提供或仔细考察任何历史例证。这些例证可能会包含着他的主张，即有些时候这类因素对于改变社会结构是至关重要的。熊彼特在其晚期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中讨论了促使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文化方面的变化，但是他认为这些变化是次要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秩序的变化。

这里有个特别值得一提的，被上述这些作者所忽略的问题，即使像马克思这样观察敏锐的人也未能例外，这就是社会革命变化的性质与原因。这个问题需要在比马克思在研究十九世纪革命时更加广泛的背景之下展开。在社会集团兴衰的过程中，我们将会注意到两种情况：一是来自新的社会阶层的个人逐渐占据权力位置，有时是通过与已有的政治精英结盟达到上述目的；另一种是新兴社会集团与原有的社会统治者之间的激烈对抗。政治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尽可能发现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集团间的流动的条件及原因。帕雷多很少涉及这些问题，他对革

命的观察是零零散散的、互不相关的。另一方面莫斯卡在《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中用一章来讨论革命的问题,不过这是他的著作中最令人失望的部分之一;他仅仅提供了对某些革命阶段的描述。在马克思之后,没有什么社会学者在解释革命的变化方面有何补充,尽管我们这个革命的世纪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近年来对这些问题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毫无疑问当推布林顿(C. Brinton)的著作《革命之解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①布林顿划分出对革命的发生有利的条件:社会经济的进步,尖锐的阶级对立,知识分子叛离统治阶级,政府机制的软弱,以及统治阶级政治上的无能。这些条件与马克思经常提出的特别是在其早期著作中所提到的那些条件并无多大差别,不同之处是革命阶级本身的形成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些条件的提出可作为更有活力的比较研究的基础。将这一理论基础运用于大部分发生在二十世纪工业落后国家的革命时便有可能体现其重要意义。这些国家高度集中了布林顿所提到的一些特点:由于贫富间的巨大悬殊造成的激烈的阶级对抗,深受西方的,主要是来自马克思的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传统的统治集团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昏庸无能,以及较先进社会所造成的影响。

在后来一些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情形:用较小的精英集团的活动无法解释当代革命——革命是由整个阶级的行动所引起的。这些阶级必须受到领导,但是领导层的精英集团产生于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① 见哥茨乔克(L. Gottschalk)的文章:“革命的起因”,[见《美国社会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4年1(1)];如果要对有关问题和拉夫·达兰多夫文学(Ralf Dahrendorf)作一简短回顾的话,可参见“Über einige Probleme d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Revolution”,引自《欧洲社会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61年,II(1)。

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之共生的。精英集团并不造就阶级,其本身也无法带来革命运动。我认为,在统治集团的地位发生逐渐变化的问题方面,上述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是由于人口中较大的集团条件的改变,新的精英才得以形成,并在一定时期之后同社会的统治者展开斗争,要求分享权力。

在研究集团的流动时,就像研究个人的流动一样,我们不得不面对收集数据资料方面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两种研究是重叠的,并且提出的问题也是相同的,因为也许有必要回顾个人的活动以便了解新的社会集团的形成或旧的社会集团的衰落。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社会集团兴衰的证据要容易一些,因为其存在和行动在正式的教科书或当代编年史中多半会有所记载,或者从对于其他社会制度的了解当中可以推断出它们的存在,例如从土地占有制度,以及宗教机构或军事组织方面去推测。但是无论我们注意精英流动的哪些方面我们都可以通过研究二十世纪的社会运动——这是超出了早期研究精英学者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给关于这些现象的历史知识提供补充(这种知识本身就可以向前大大发展)。在过去二十年间,工业社会中的精英流动已成为无数研究的热门题目。不发达国家现在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对于从一些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收集起来的例子的回顾——我在下面两章将要讨论这方面的情况——有可能使我们得出一些比我们在这里所批评的观点更加言之成理的结论。

第四章 知识分子、管理人员 和官僚

在二十世纪社会政治剧烈动荡的风云中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集团中,有三种精英——知识分子,工业管理者以及政府高级官员——常常被单独挑选出来作为早期统治阶级功能的继承者,并且成为新的社会型态的创建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代表。他们在推动变革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何等重要作用?他们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被当作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产物,或更加强大的利益的代表?我们应该明白,将这些巨大的社会影响归功于这些精英集团首先是接受精英理论的结果,而且也是赞同该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直接结果。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近代西方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工人阶级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而有关知识分子、管理人员,以及管理兴起的理论则全都对此加以非难,并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的过渡将导致“无阶级的”精英的新陈代谢(即精英在不同层次的权势人物间的较为完善的流动),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又坚持在统治精英和群众之间存在着区别的主张(即不会导致无阶级社会)。因此在考察这些精英的兴起时,我们应该考虑,首先,他们与主要的社会阶级是怎样联系的,以及他们在什么程度上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体系;其次,他们在苏联式的集体主义社会中产生影响。

在这三种集团中,最难定义的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难判定的。我们可以从划分“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和“intelligentsia”(技术人员)入手。“技术人员”一词最初出现于十

九世纪的俄国，用以表示那些受过大学教育因而有资格从事专门职业的人，从来许多作者将该词的外延加以扩展，用来表示所有从事非体力劳动职业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该词的意义相当于“新的中产阶级”，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划分出上层和下层——上层由那些从事专业性职业的人组成，下层则包括那些担任日常事务性的行政工作的人。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一词则一般指前者当中较小的一部分，即那些直接从事创造新思想，将其付诸实践以及理论批评等工作的人，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思想家、社会理论家及政治评论家。这一集团的范围很难确切地界定，其下界与中产阶级的职业相互混合，例如教师和记者，但是其特征——直接关注社会的文化——却是显而易见的。

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可以找到知识分子——如不开化社会中的术士、祭司、歌手、风水先生等等，以及文明社会中的哲学家、诗人、剧作家、官员及律师——但是他们的作用及社会意义却各不相同。在某些社会中，知识分子几乎就是统治精英的同义词。在中国，经过漫长的时期，“士”形成了统治阶层，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这是通过对富家子弟的教育完成的。^①这并不是一个世袭的、排外的集团，因为通过公开竞争的考试便可进入该集团；但实际上在封建时期，该集团是通过来自大家族的成员加以补充的，以后则是由来自社会上层（包括相当数量的官僚家庭）的成员补充的。尽管如此，一项对 1600 - 1900 年间士的统计分析表明，大约有百分之三十进入统治阶层的人来自普通家庭，即来自精英以下的社会阶层，虽然其中有些人的确来自殷

^①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士》（*The Chinese Literati*），见格尔斯（H. H. Gerth）和米尔斯（C. W. Mills）所编的《马克斯·韦伯论文集》（*From Max Weber*）一书。

实之家。^① 在印度,从婆罗门自己建立社会的统治层的意义上说,存在着相似的情况;不过与中国的情况相比有些重大的区别,因为婆罗门是世袭的种姓而且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与其说是知识性的,毋宁说是宗教性的。另一方面,在欧洲封建社会中,牧师所占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知识分子才开始发挥较为重要的社会作用。

一般来说,近代知识分子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大学。^② 大学的发展,伴随着人文学科的传播,使得知识分子阶级的形成成为可能。这种阶级不同于僧侣式的特权阶级,它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脱离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及其学说。这个知识分子阶级造就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特别是在法国,知识分子通过反统治阶级和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教会,使自己成为社会的批评者。正是在扮演批评社会这一角色时,近代知识分子才显得引人注目。许多文章,特别是在批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时,强调了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及最近在不发达国家的过渡过程中的作用。最早研究知识分子影响的作者之一是一位波兰革命家,瓦克罗·马加斯基(*Waclaw Machajski*)。他在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是在《知识工人》(*The Intellectual Worker*, 1905)^③ 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代表了失意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并且这个运动的成功不会导致无阶级社会,而是以在他称之为“国家资

① 马什(*Robert M. Marsh*):《中国的官员:1600-1900 中国的精英流动》(*the 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 in China, 1600-1900*)。

② 见《文化社会学论文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中所收入的高夫(*Jacques Le Goff*)的“中世纪以前知识分子”(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以及卡尔·曼海姆的“知识分子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Intelligentsia)。

③ 他的书是用俄文写的。马克斯·诺马德在《反抗者和叛逆者》(*Rebels and Renegades*)中第一个用英文解释了他的思想观点,我的引文便出自这里。

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社会中与新的中产阶级联盟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新的统治阶级的建立而告结束。马加斯基本人并未对社会主义的前景彻底悲观失望,他认为通过教育的发展,知识分子的优势将会消失,最终将出现无阶级社会。不过总的来说他的著作受到了冷落,而且他的革命知识分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所利用:先是马克斯·诺马德(Max Nomad),后来是拉斯维尔(H. D. Lasswell)。后者提出了一个迄今极为流行的观点,即二十世纪的大部分革命都是由在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成功地夺取权力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

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其他一些学者则持有不同的看法。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莫斯卡把知识分子当作多少独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集团,这一集团有可能成为新的、更加卓越的精英的核心。在他的 *Terrica dei governi e governo parlamentare* 的最后部分,他这样表达了他的愿望:“如果有一个社会阶级愿意哪怕暂时将其私有利益放在一边,并以一种必要的超然态度考虑一下共同的利益,那么这必然是这样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具有高贵品质的、众望所归的、前程无量的阶级……唯有这个阶级才会心甘情愿地牺牲眼前利益以避免未来的灾难。”几十年以后,卡尔·曼海姆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从“社会上彼此无关的知识分子中”发现了一个相对来说具有无阶级性质的阶层,其成员来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通过教育联系到一起的,并且包容了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利益。^① 根据曼海姆的说法,由于这些特点,知识分子能够对社会,特别是其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得出相对完整和客观的概念,并能够独立采取措施以提交更加普遍的社会利益的地位。

在我们所回顾的上述两种观点中的确含有真理。知识分子

^①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第136页及以下各页。

在激进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在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古巴革命以及许多国家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从理论上说他们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浓厚兴趣,他们组成精英并在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的口号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然而,从其他方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这种兴趣。发生于西方社会的工人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抗议运动。与只能在宗教幻觉中表达希冀的奴隶和农民的几次起义不同,上述这些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与社会主义理论有关,而知识分子当然在这种理论的完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之所以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令人羡慕的位置,并且在某程度上发现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具有下列一些特征——公平合理、铁面无私,甚至有来世那种迷人的境界——这些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本身是极为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也同样具有重要性,也许更加重要,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来源。在许多近代社会中,高等院校,以及所有知识分子的职业都为才华出众的人从社会下层上升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供了重要途径。结果知识分子精英的社会构成同其他精英相比具有很大区别,而且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许多知识分子乐于同工人运动结盟。

这种观点说明知识分子精英并不满足于本身职业方面的利益,他们宁愿与主要的社会集团联合起来并为之服务。根据第二种观点,知识分子形成一个能够客观地看待社会并能够持久地捍卫整个社会之利益的集团。这种观点将知识精英置于所有阶级之上,同时否认知识分子自身有可能建立某一特定的利益集团。

上述这些观点都没有正确指出当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处环境的复杂多变和反复无常的特点。首先,在欧洲、北美的工业国家中,各国情况存在很大差别。雷蒙·阿宏(Raymond Aron)在

《知识分子的麻醉剂》(*The Opium of Intellectuals*)一书中曾指出,同英国、德国、美国的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与国家管理等政治实践联系并不十分密切,他们是社会中比较激进的批评者。一项对从1871—1958年法国国民议员的研究表明,在此期间选出的六千多议员中,有半数以上是广义范围内的知识分子——作家、大学教师、律师、记者、科学家、工程师、中小学教员。该项研究的结论是,“至少在法国,像第三共和国一样,第四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辩论充满了激情。他们往往是毫不妥协的理论家。从抱有某种认真的态度,易于抽象地提出问题,又往往能够解释这些问题的意义上说,他们的‘思想似乎如出一辙’。但这种倾向意味着他们常常提出不现实的解决办法,而且他们往往偏重词藻而忽略了实质内容,因而由于异想天开地提出某些空幻的问题,并且彼此间争论不休,结果毫无异议地拖延了议会辩论并使之复杂化。”^①另外,通过研究《小拉露斯字典》上所记载的法国伟人,发现那些绝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学者——所占的显赫位置也是非常有趣的。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形成了最大的集团,几乎占了半数,而且直到十九世纪末(该研究所涉及的最近的时期)他们的显赫地位仍在继续上升。^②在英国,知识分子并不像在法国那样享有如此崇高的社会威望,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也没有这种

^① 多根(Mattei Dogan):《阶级社会中的政治回顾:1870-1958年的法国议员》(*Political Ascent in a Class Society: French Deputies 1870-1958*)。见马雅克(D. Marvick)主编的《政治决策者》(*Political Decision-Makers*),第67页。

^② 《法国社会的成就》(*La réussite sociale en France*),阿兰·吉拉尔(Alain Girard)编,第239-240页。编者认为,从不同的国家得到相似的材料以便为对比不同环境中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影响建立基础,这是件有趣的事。不幸的是,事情至今还没有真正开始,或者说尚未计划好。关于知识分子的最新的论文集——于扎尔(G. B. de Huszar)所编的《知识分子:引起争论的形象》(*The Intellectuals: A Controversial Portrait*)——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对他们的社会作用的印象主义式的描述。

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议员人数方面,还是在社会思潮和社会批判等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方面都是如此。只有在少数场合,知识分子集团才吸引公众的某些注意,或是产生某些直接的政治影响,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最明显一些例子是功利主义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早期费边主义者(the early Fabians),以及与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组织有关的知识分子了。

第二个重要的特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国家的知识精英是一种来源复杂、行为迥异的精英,并显示出在文化及政治方面的观点大相径庭的特征。知识分子不可能在政治上全都属于,或一度属于左派,在目前,举例来说,欧美国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右翼。很多证据表明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受到他们本身社会阶级根源的强大影响,例如在法国,在早期私立政治学校(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中的学生(他们几乎全来自上层阶级,观点右倾)和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的学生(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观点左倾)之间便存在着明显差别。现在还不清楚知识分子会不会由于他们的行动和生活方式的性质有所不同,因而同其他精英相比较少受到其社会阶级根源的影响。另外,历史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态度也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是由比较普遍的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美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左翼政治的支持者;但是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却出现了公开的右倾化运动,这也许可以用受到财产立法影响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或者知识分子本身特点的变化来解释。

这里需要考虑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子最近一段历史中的两个特点。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及其他专业部门的增加,知识精英的规模和内部分歧都扩大了,特别是在下层当中。与此同时,知识精英内部不同集团的相对主要性发生了变化;某

一类专家已处于能够支配描述一般文化或社会思想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地位。从自然科学家对公众的吸引程度上不难看出其社会作用正与日俱增。从要求通过增加科学家在咨询机构中的人数,扩大他们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的代表权(例如通过建立科学部)以便提高他们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的日益强大的压力中也不难得出相同的结论。上述情况发展的结果是,知识分子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整个社会的激进的批评者,而是更加关心解决产生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工业社会的复杂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影响在莫斯卡所预期的某些方面有所增加;但是他们越来越多地从事具体的专门工作这一事实,使他们更加缺乏成为统治精英的资格;因为他们缺少任何独立的集团组织或意识形态。正是在当前尚不发达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才经常形成团结一致的、激进的精英,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个作为潜在的统治精英而引人注目的集团是由工业管理者组成的。在某个时期,当代社会中管理人员的出现已成为社会学领域中争论不休的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管理革命理论的影响。^①更早些时候,凡勃伦(Veblen)在《工程师与价格体系》(*The Engineers and Price System*)中就阐述了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即一种主要是由生产手段的所有者所统治的生产制度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因为它无法充分使用工业资源,但是他并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最终将导致无阶级社会的观点。他在技术专家身上看到了反对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倾向,当代工业的发展有赖于这些“工程师”的工作,而且他们处于能够采取下一个行动的地位。“由于强力或

^① 詹姆斯·伯纳姆:《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环境的原因他们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的拥有者,尽管到目前为止对于被统治的各阶级来说他们实际上一直是自由收入的所有者或提供者。他们被推到对工业体系负责的地位,同时也变成了社会物质财富的主宰。他们开始具有阶级意识,而且从那种辛迪加的主人(syndicated owners)和联合的工人是既得利益者的商业意义上讲,在可能给他们带来既得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已不再受任何商业利益的控制。与此同时,从数量上和一般外表上看来,他们不是联合的工人那种来自不同阶层的、难以驾驭的集团,其数量之有限和彼此不同的利益实际上使他们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同上书,第174页)

伯纳姆的文章内容大致相同,只不过论述得更为详尽罢了。他认为我们正处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时期,即从资本主义社会(一种以工业家和银行家以及特定的信仰和意识形态体系为代表的,以特定的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社会)向另一种他称之为“管理型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解释向这种社会的过渡过程——“管理革命”——之前,他讨论了关于资本主义衰亡的主要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他的批评也是我们似曾相识的:首先,俄国革命并没有揭开社会主义社会的序幕,其次,在大多数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并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即使有过少数几次也都流产了(例如1918年在德国)。他本人的理论首先论述了谁是管理人员,然后他又表明他所论证的集团实际上正在变成社会中的统治精英。伯纳姆在管理人员中划分出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科技工作者和生产过程中的经理和协调人员。后者是真正的管理者,伯纳姆将他们同凡勃伦所说的“工程师”区别开来,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具有科技水平。实际上,他们是经济实体中的高级经理人员。伯纳姆对这些人社会地位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关于近代工业社会中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将很快分离的观点的影响。这种分

离的观点为十九世纪研究社会的人们(包括马克思)所熟悉。他们观察到了联合股份公司发展的结果,但是其意义是随着近代大型公司的出现而日益明显的。伯利(A. A. Berle)和米恩斯(G. C. Means)在合著的《近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首次对大公司的出现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伯纳姆的论点是管理者已掌握了先前为操纵工业资本的所有者把持着的经济大权,并且管理者正在获得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权力。他试图通过说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正在被一种管理的意识形态所取代来支持他的观点——这不仅要求管理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而且要求他们必须是一个统一的集团,并且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中明了他们自身的集团利益。作为后一种观点的证据,他回顾了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联合的经历(这种联合没能维持多久),苏联的情况(苏联作为管理型社会的例子是差强人意的,这一点在本章后面部分我还将讨论),以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少数几个国家计划的情况。

后来的批评明确指出,在近代工业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基本理论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正确性。在某些方面工业的所有制和管理者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首先,从拥有公司的主要股份的意义上说,管理者往往就是那些所有者:尽管股权可能相当分散,但这反而使少数控股较多的成员更容易左右公司的决策。^①其次,即使管理者在其所属的公司中不是主要的股权持有者,但他们通常是富人:就像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所指出的那样,“主要的经理和大亨们不是两种各不相干和彼此明显分离的集团。他们在财产和特权的共同世界中彼此协调

^① 见弗罗伦斯(P. Sargant Florence)的《英美工业的逻辑》(*The Logic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ndustry*)。

得很好……”(第 119 页)再其次,管理人员主要来自社会上层。根据米尔斯,在 1950 年的美国,“高级管理人员不是那种在城里混得不错的乡下人。”也不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这些都市的、白皮肤的、信奉基督教的美国人来自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中的上层家庭。他们的父亲大多为企业家,他们当中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农民的后代。”其他一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果。威廉·米勒经过周密调查本世纪初十年间一百九十位美国主要的企业领导人的出身背景后指出,即使在那个时候认为典型的成功的企业家来自社会下层的观点也是极其错误的。^① 在他所研究的这些人当中有不到百分之十是在国外出生的,其中只有百分之一可以算作是“贫穷的移民”。大多数人来自大中城市的古老的美国家庭;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自实业家或专业人员的家庭。一项详细调查 1940 年费城上层阶级实业界精英的结论显示出“……上层阶级为企业界贡献了就比例来说数量大得多的领导人员:《名人词典》中百分之七十五的银行家、百分之五十一的律师、百分之四十五的工程师、以及百分之四十二的实业家都是上层阶级的成员(即来自名门望族)。此外,在工业和金融机构中有五百三十二个经理位置被精英人物所占据,其中来自上层阶级的成员占百分之六十。最后,该城市主要的银行家和律师都是上层阶级的成员。六家最大银行的总裁和百分之八十的经理人员是地地道道的费城人,这和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中的高级代理人的情况是一样的。”^②

在英国,一项对大公司经理的调查表明,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经理在开始工作时已经具有了在家中从事实业的经验,而

^① 《美国历史学家与实业精英》见威廉·米勒所编的《从事实业的人》(Men in Business)。

^② E. Digby Baltzell,《美国商业贵族》(An American Business Aristocracy),第 431 页。

另外的百分之四十则来自土地所有者、专业人员和其他社会地位相近的家庭。^①

显然高级管理人员和财产的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才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单一的社会集团。中下级经理人员的情况大致相同，因为充实有关人员的背景范围是有限的，而且由于这一级别的大多数经理都希望得到提升。他们对社会的看法大体相同，也都希望建立像高级经理人员那样的社会关系。在攀登经理的阶梯时，他们获得了更加实际的经济方面的利益。在所有这一切现象中并没有什么“管理革命”即将来临的迹象，同时与伯纳姆的新的管理意识形态的描绘也毫不相干。管理者们，特别是高级经理形成工业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功能集团；从享有很高的声望、并能作出重要的经济决策的意义上说，他们也是精英，而且他们越来越清楚自己作为功能性集团的地位（这种意识又由于在管理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和训练的发展得到加强）。不过他们无法独立于作为有产者的上层阶级之外，也不可能变成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我们来考虑第三个社会集团——高级政府官员。在很多观察者看来，这是近代社会中一个权力日增的集团。社会学者对官僚精英的关注最早见之于马克斯·韦伯在“同马克思的幽灵”（with the ghost of Karl Marx）及其追随者的长期论战过程中写下的著作中。由于担心社会主义会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和社会生活的军事化，致使韦伯越加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从近代社会历史中发现生产资料集中在一小部分资本家的手中，工人阶级对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将是人类自由发

^① 科普曼(G. H. Copeman):《英国工业领袖:对一千多位国营公司总裁事业的研究》(*Leaders of British Industry: A Study of the Careers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Public Company Directors*)。

展时期的开端,然而从同一历史中韦伯看到的却是行政手段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对个人产生严重的后果。“……近代国家的发展始于君主的行动。他为剥夺他身边那些自行其事、‘私自’拥有执行权的人和那些依靠自己的势力拥有行政手段,拥有财产及金融组织的人戟平道路……整个过程是同资本主义通过逐渐剥夺独立的生生产者以建立企业的过程平行发展的。最后,近代国家彻底控制了政治组织的所有活动……”^①

韦伯不相信政治当局会限制官僚的权力,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情况也是如此:“在正常情况之下,官僚的权力地位总是高高在上、压倒一切的。‘政治主人’发现自己处于‘门外汉’的地位,站在‘专家’的对立面,他面对着的是行政管理机构中训练有素的官员。这些情况表明,官僚们为之服务的‘主人’是拥有‘立法权’、‘投票复决权’和撤换官员权力的‘民众’,或者是在更加贵族化或更加民主化基础上选出的,有权投不信任票的议会……”^②

毫无疑问,韦伯的解释过份地受到了普鲁士官僚制度的例子以及德国自由派政治家的软弱无力现象的影响。然而在很多观察者看来,他关于官僚权力不断膨胀的观点得到了近代欧洲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支持;特别是俄国社会革命的经历以及工业民主国家中对经济活动采取更加广泛的控制所导致的后果的支持。南斯拉夫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新阶级》(*The New Class*)一书中将韦伯的观点充分运用于苏联社会制

^① 马克斯·韦伯:“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见哥尔斯和米尔斯主编的《马克斯·韦伯论文集》。

^② 马克斯·韦伯“官僚”(Bureaucracy),同上。

度的分析。吉拉斯说：“这个新的阶级，官僚阶级，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政治官僚，具有早期统治阶级的一切特征，而且还有一些新的特征。这个新阶级是由因垄断了行政权而享有特权及经济上的种种好处的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这同时，吉拉斯也不得不承认，其成员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府官员或者行政人员：“……深入的分析表明，只有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即那些不是行政官员的人，才组成了统治官僚（或称新阶级）的核心。这实际上是政治官僚中的一个党派，其他官员不过是新阶级控制下的工具而已。”后来他不得不承认是“政党造就了阶级”，但是他又试图通过阐述下列观点以避免这一结论所造成的后果：“结果阶级开始成长，并将党派作为其基础。当阶级变得强大时，党派则正在衰退。”最后，他试图将这一现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断言新阶级是由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决定的：“……关于这是一个特殊阶级的证据存在于该阶级的所有权及与其他阶级的特殊关系之中……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可以使用、享受及随意处置国家财产。”

我认为，这种对苏联社会中精英的分析是错误的。吉拉斯本人也承认，新阶级在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官僚，因为这一阶级并不是由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组成的；实际上它根本算不上什么官僚，因为其成员——具有高级身份的党员——并不是官僚所组成的，就像工业领域中的管理人员不是官僚一样。^①他们是通过运用政治手段——雄辩滔滔、精力充沛、坚韧不拔、善用策略等等——而不是靠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考试而获得领

^① 参较米尔斯：《权力精英》（第133页：“准确地说，官僚的事业并不仅仅意味着向着世袭官僚的方向一点一点向上爬。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为每个已占据的官位设置严格的、单方面的资格标准。通常这些资格标准包括特定的正规训练和资格考试。”）

导权的。^① 同样,政党的统治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官僚性的。吉拉斯在表示“政党造就(新)阶级”的同时又试图通过补充“当阶级变得强大时,政党的力量却在削弱”以减轻前一观点的份量,这样一来,他实际上是承认了党派的统治是政治性的这种观点。关于是否任何共产党国家中共共产党的力量都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削弱的,我们找不出任何证据;他所表达的只是一种道德评价,一种对理想的政党——即无产阶级革命党——走向衰亡的论断。最后,认为政党是由于控制了生产资料而进行统治的观点是错误的;正相反,政党是因为有了政治权力才得以控制生产资料的。就像一位波兰社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按照自由派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十九世纪的社会阶级概念对当代社会已基本不再适用。在社会结构的变化多少受政治当局的决策左右的情况下,我们离……由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所决定的阶级,或者照其他一些人的说法,由同市场的关系所决定的阶级……还相距很远。在政治当局能够公开有效地改变阶级结构的情况下,在对社会阶层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权,包括在国民收入中分享较高的份额是根据政治当局的决定授与的情况下,在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官僚等级中的某一个阶层的情况下——十九世纪的阶级概念就会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而且阶级冲突也让位于其他形式的阶级对抗。”^② 这清楚地表明,当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下层也处于官僚制度的控制之下时,统治集

① 一位美国人阿姆斯特朗(John A. Armstrong)写的研究苏联官僚的书《苏联的官僚精英,对乌克兰机构的研究》(*The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A Case Study of the Ukrainian Apparatus*)提出了大致相同的官僚统治方面的观点。实际上作者是在说明人们越来越强调党务官员在特别的党校的正式训练。但他并没有说是否能进入最高的权力机关取决于在这种教育体系中能否获得成功,即能否取得正式资格,而不是取决于政治领导实践方面的成就。

② 沃索斯基(Stanislaw Ossowski):《社会意识中的阶级觉悟》(*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第184页。

团本身就是政治权威。

我并不想说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中的高级官员没有影响力，我只想表示他们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即使在斯大林时期，执政党也明显地考虑到了包括官员们在内的各种精英集团的意见和要求，而且在较为自由的赫鲁晓夫当政时期，高级官员、企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等也对社会政策明显具有某种独立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在执政党的监督之下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

西方国家中官员的情况与上述情况截然不同吗？很多作者注意到他们称之为官僚权力膨胀的情形，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公共行政管理日益复杂化所造成的。一位批评法国行政管理精英的人用下述语言描写了这种情况：“他们（高级官员）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独立的、自我更新的实体，该实体不受政治干预的影响，它是一块能够经受政治暴风雨无数次徒劳地冲刷击打的岩石……”^①；而另一位学者在考察法国的“管理革命”过程时，则注意到“专家的两个集团正倾向于在国家政权中占据像在经济领域中那样的主导地位。行政管理精英的后备力量主要来自财政稽核官（Inspeteurs des finances）及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的成员；这些人无论在哪儿都是很有声望的。由于这些行政人员常常转入私营部门，因而他们在银行和大型工商企业中也随处可见。另一个来源是综合工科大学（Ecole polytechnique）的毕业生，他们组成了国家技术部门的精英，同时也不断有很多人变成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②

这些观点在法国非常流行，因为当政治权威本身力量削弱或不稳定时，官僚的权力就明确地显现出来了。但是在所有西

^① 卢奇：（H. Lüthy）《法国的国家》（*The State of France*），第17页。

^② 谢格菲尔德（Andre' Siegfried）：《从第三共和国到第四共和国》（*De la IIIème à la IVème République*），第246页。

方国家中,这些观点则是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的。有时候正像我们上面所引过的安德烈·谢格菲尔德(André Siegfried)的书中所说的那样,这一观点是同“管理革命”的一般理论相联系的,而且有人认为私营工业和国有企业的经理同政府高级官员一起正在组成统治精英。对下列情况的观察支持了这一观点:在管理和行政这两种不同的部门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员交流的情况。我曾经说过管理人员并不建立独立的权力精英,官员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决策权无论增加到何种程度,最终仍将受到政治权威的制约,而且民主国家中政党间的冲突是使这种制约手段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另一种手段我们称之为官僚本身的道德准则,特别是政治中立理论;在许多西方国家中,特别是英国,这种理论对高级官员夺取政治领袖的决策权的野心具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官员们像工业部门的管理者一样同社会的上层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其直接影响公共政策方面说来,他们更容易按照维护阶级利益的方式行事,而不是以他们作为新兴的权力精英的特殊的利益为目的。在英国,凯勒赛尔(R. K. Kelsall)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29-1950年期间,当为高级文官机构的行政人员提供后备力量的来源扩大之时,来自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的(半技术或无技术的)工人阶级的官员仍是凤毛麟角。在另一方面,高级文职人员的百分之三十来自只占人口百分之三的有产者或专业技术人员家庭。^①我本人对法国高级文职人员的研究表明,这种后备人员方面不成比例的现象更加严重:在最高一级上,即全体商级官员(*grands corps de l'Etat*)这一级上,百分之八十四的官员来自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来自

^① 凯尔赛尔(R. K. Kelsall):《英国的高级文官》(*Higher Civil Servant in Britain*),第153页。

工农家庭。^① 另外，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大部分高级文官都在独立的、上层阶级的学校或者只收富家子弟的高等院校中受过教育，这样上流社会的观点便根深蒂固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在法国，直到1945年为止私立政治学校(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在上层阶级中行政精英的组成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该校的创始人埃米尔·布米(Emile Boutmy)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宗旨：“特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民主的潮流势不可挡。上层阶级(就像他们自己所称呼的那样)不得不承认多数人的权利。他们只有让最有能力的人行使其权利才能维持他们的政治统治。在他们行将崩溃的特权和传统的壁垒后面；民主的潮流将会遇到由不容否认的杰出的才能和高尚的品质筑起的第二道防线……”^② 包括创建国家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在内的法国战后更新高级文官的改革改变了培养行政精英教育的宗旨——使这种教育更具有“管理”的内涵，更少“上流社会”的气息——但是这并没有使高级文官更新的社会来源发生重大改变。另一方面，在美国由于没有全面的职业文官系统，特别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这就防止了行政精英的形成，并使将某些上流社会成员安置到行政岗位上这件事同上层社会家庭联系更少。^③ 米尔斯认为缺乏地地道道的官僚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使美国社会得以建立不承担责任的权力精英：“从可靠的文官职业或者独立于政党压力之外的官僚体制的意义上

① 这一研究将以《法国的官僚与社会阶级》(*Bureaucracy and Social Classes in France*)为题发表。

② 1871年2月25日的一封信。

③ 见本迪克斯：(R. Bendix)的《美国社会的高级文官》(*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American Society*)。从高级文官很少来自工人家庭的意义上说，美国文官的更新情况与英国和法国的相似。但其整个的社会结构不同，因为美国社会中占多数的是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中的下层。此外，美国高级官员的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参政前所从事的职业也彼此不同。

说,美国从来没有过,现在也没有地地道道的文官系统……无论是执政官员还是政治家都不需要这样一种专业行政人员所组成的集团:他们完全不受政党的影响,经过训练和亲身实践,他们已成为仔细判别不同政策所引起的后果时必不可少的宝贵人才。”^①但是这样说等于忽视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情形。在欧洲国家中,真正的官僚制度中的高级官员和社会的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上述对在现代社会中占有首要位置的三种精英的讨论引出了一些关于精英与阶级的关系,以及关于精英的流动的有趣的结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官僚,我们都不应真正把他们看作是统治精英位置的竞争者。在这方面,上述三个集团当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统一或真正独立的。在正常情况下,很明显知识分子内部是勾心斗角的,但是所有这三个集团都显得缺乏一种统一性,因为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创立任何说明他们在社会中特殊重要性和目标的理论。一项对他们特点的研究揭示了一个问题的解决线索。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在批评精英理论时非常雄辩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帕雷多丝毫也没有作任何尝试以表明他所说的‘精英’拥有集团的显著特点……”,“在精英理论当中最成问题的部分是什么是精英,……这个问题上两位作者(莫斯卡和帕雷多)都偷偷塞进了在政府中发挥作用的人们组成一个统一的集团这样一个有待证明的推理……”^② 尽管阶级概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我认为说明当代民主国家中存在着广泛的阶级利益(加上特定组织的形成、政治意识形态和选举活动所提供的证据)比起证明我们所考察过的精

^① 米尔斯:《权力精英》,第239、241页。

^② 弗里德里克(Carl J. Friedrich):《普通人的新形象》(*The New Image of the Common Man*),第257-258页。

英集团有相似的集体利益或者甚至集体的“精英意识”(elite-consciousness)要容易得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精英的独立性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们有其阶级属性,这种属性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知识分子的情形,也可能是单一的,像管理人员或官僚的情形;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必须被视为社会阶级的代表。官僚是受共产党国家中的单一政党或民主国家中的多数政党所组成的政治当局直接控制的。看来这些精英扩大影响的意义不在于他们都是为夺取更高权力而斗争的潜在的统治阶级,而在于他们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可能会制约某一时期社会统治者的权力。

第五章 传统性与现代性发展中 国家的精英

当前,人们最经常地使用精英概念是在讨论“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与前景的时候。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我们早已看到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精英的兴衰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变化首先将对不同社会集团的特权及势力产生影响,于是那些力量不断发展的集团便寻求对上述变化加以控制,并将其纳入他们所设定的轨道。与此同时,在那些社会变革复杂多样、困难重重,人们业已习惯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地方便会产生对杰出领袖和精英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可以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里找到考察产生新的精英的社会力量,以及精英在努力建设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时所进行的种种活动的绝好机会。

诚然,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具有从历史、地理、环境,以及同其他民族的特殊关系中产生的种种特征以及问题,这些特征与问题对该国的发展总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具有,或者在同属于某一特定类型的国家中都可以找到很多重要的共同点。我们暂时撇开国家幅员的大小及自然资源等因素,首先划分出不发达国家的四种主要类型,这四种在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都有重要的相似之处的国家是:一、非洲国家;二、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三、亚洲国家;四、拉丁美洲国家。第一类国家通过从事对其政权具有深刻影响的反殖民斗争获得了独立。除了经济发展问题以外,这些国家还不得不面对由部落所

组成的国家的巩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部落集团在这些国家疆域内的存在是殖民势力任意瓜分非洲的结果。在第二类国家当中,一部分是通过直接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获得独立的,但是许多国家早已获得政治独立,它们主要是反抗外国势力对其经济资源的间接控制。它们在政治方面所遇到的主要是摧毁造成极为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封建独裁统治的问题。第三类国家——亚洲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它们大都为拥有古代文明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当中,传统社会的风俗习惯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一些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虽然它们无需像非洲国家那样统一部落集团,但是由于它们被分成种姓和不同的语区(例如在印度),或者按语言和种族分成不同的集团(如锡兰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马来亚的马来人和华人),它们也面临着民族统一的相似问题。第四类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与其他三种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些国家经济上大都比较发达,它们基本已从农业社会进入都市社会^①,尽管它们不久前刚刚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而且这些国家已有较长的政治独立的历史。因此,它们所面临的政治问题还没有严重到涉及民族统一的程度,尽管某些像秘鲁这样的国家中还存在着众多的印地安人如何获得全部公民权的问题。这些国家近来的政治运动也不是民族主义分子直接发动的,尽管这种政治运动已日益具有强烈的反对北美在该地区经济影响的色彩。主要问题是由工业化、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产生于政治体制中的工人运动所引起的。这种政治体制长期以来一直受大地主的支配并常常处于军事独裁者统治之下。

不发达国家一般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① 在阿根廷和智利,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为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在巴西为百分之三十六。

(这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业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榜样,并且在不同国家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来自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和其他社会福利的发展而导致的人口的迅速增长;来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当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经济秩序、政治稳定以及由于传统习惯的衰落而导致的大众良好的心理准备等种种有利的条件下开始的,是一个漫长的、平缓的过程。由于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会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同不发达国家竞争,因此不发达国家面临着经济方面的困难。除此之外,不发达国家还得同政治不稳定、同人们对高消费和福利所提出的要求以及传统生活方式的强有力的抵制作斗争。

在这些情况下,能够号召采取有力行动、控制局势并因势利导的精英和领袖人物的重要性便显得格外突出。由于大众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缺乏组织经验——在本国或外国的独裁统治下这些大众过去一直处于俯首贴耳、逆来顺受的地位——这使得精英和领袖人物的出现显得更加重要。那么谁是推动经济发展或承担这一重任的精英呢?他们领导的结果又如何呢?最近一项对工业化的研究提到了这类精英集团。该项研究认为:“有五种自然而然并以不同方式领导工业化进程的理想的精英类型……一、旧朝精英;二、中产阶级;三、革命知识分子;四、殖民统治者;以及五、民族主义领袖。”^①其中两种精英在目前的时期中相对来说并不太重要,故他们的有限影响我们可以一笔带过。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中,殖民统治者通过建立有效的统治和司法制度,创办现代教育,发展银行业和商业以及某些近代工业,

^① 见克尔(Clark Kerr)、邓洛普(John T. Dunlop)、哈比森(Frederick H. Harbison)所著《工业主义和工业人》(*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第三章:“工业化精英及其战略”,第50页。

为工业发展创立了某些必要条件。^① 尽管如此，这些成就还不能直接导致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其理由是殖民地势力的经济利益以及外国统治的阻碍作用都造成了严重的障碍，因为凡是大规模的工商业的发展都被控制在殖民者本国人的手中。在那些至今仍受殖民统治的国家中，通常认为外国统治者所能做的不外乎为经济发展准备条件，这一点新的精英只有在取得独立之后才能积极地办到。

旧朝精英的作用——无论是来自大地主抑或商业贵族——也是有限的。在中东和拉丁美洲少数几个国家中，这类精英试图（有时是受了外国的压力）自上而下地进行社会和经济变革。但是他们在维持现存社会时本身的阶级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行动。为了顺利地执行改革政策，他们将不得不允许，并且鼓励社会有更大的流动性，加速发展教育，并为来自下层社会的个人与集团进入他们的精英圈子创造一定的条件。令人怀疑的是他们能否放手这样做，并以足够的速度完成任务以便满足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并应付与他们一起竞争群众支持的新的精英的挑战。

我上面提到的另外三种精英在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整体的中产阶级不光通过贡献他们特殊的技能，而且通过他们所赞赏的现代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在各种类型的发达社会中，中产阶级中的不同集团多少都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中，中产阶级大都产生于殖民统治者带来的教育和行政系统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一位印度历史学家米斯拉（B. B. Misra）在用大量资料说明印度中产阶级的成长时，提到“印度中产阶级

^① 这里我提到了殖民统治所取得的真正成就。我并不想断言如果没有殖民征服，当地便不会有类似的发展，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在我看来仍然是个谜。

的大多数组成了知识界——政府官员、其他薪水雇员以及各种专业人员”。^① 知识界在中产阶级中占多数的主要是因为没有机会形成本国的实业阶级，而这又是由于经济增长的缓慢和来自殖民者宗主国的人在仅有一些现代工业领域中的特权地位造成的。这些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白领”中产阶级的优势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计划和集中力量发展国营企业而不是私营企业的努力没有为实业家阶级提供多少发展的余地。另一方面，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中，实业阶级则形成较早，并且成为中产阶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实业阶级在目前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自 1958 年以来，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而人口却在不断增长。这种形势，加上拉美的企业公司同在原料工业方面占有很大份额，并在过去曾无情掠夺自然资源并将利润转移到国外的北美企业公司的合作使实业界精英名誉扫地。古巴革命进一步推动了反对实业界精英以及北美企业利益的运动。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的政治学说和活动逐渐令人疑窦丛生，但是人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服务于社会主义计划的新的精英正在整个拉美迅速发展。

在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里，“白领”中产阶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高级政府官员集团。在大规模实施经济社会计划的国家中，他们负有特殊使命，并拥有特殊的权力。在很多方面，二十世纪政府官员与新兴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就像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企业家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一样。但是虽然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他们的权力却受到很大限制。资本主义企业家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其影响一直扩展到政府及其他行政部门，然而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却不过是政治领袖的附庸而已。

^① 米斯拉 (B. B. Misra):《印度中产阶级》(The Indian Middle Classes), 第 343 页。

与先进工业国家不同的是，在不发达国家不再有什么管理革命或官僚政治方面的变革。

在不发达国家中，正是政治精英在决定发展进程方面具有权威的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精英的来源可以在上面提到两种集团中找到——要么来自民族主义领袖，要么来自革命知识分子——在某些情况下这两种集团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和非洲国家中，知识分子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学生常常是独立运动中的急先锋，留学海外的人建立或帮助建立起民族主义政党。一项对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初期精英的研究注意到大学生当中激进思想的传播和具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并且指出在反殖运动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尼人形成了积极分子中的主体。^① 在尼日利亚，一种“受过西方教育并且靠个人奋斗成长起来的”精英，在独立运动发展过程中取代了来自传统的统治者家庭的老的精英（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新老两种精英有时是重叠的，因为老的精英家庭最有条件为其子女提供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② 在《非洲政党》（*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一书中，霍奇金（T. Hodgkin）也指出民族主义的政治精英的补充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新的“中产阶级”，特别是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1954年加纳议会选举之后，百分之二十九的成员是教师，百分之十七是职员、会计等等，百分之十七是自由职业者。在前法属西非的八个国家的立法院当中，经过1957年的选举后，百分之二十二成员是教师，百分之二十七是政府官员，还有百分之二十是自由职业者。（同上书，第29页）

① 尼尔（W. Van Niel）：《近代印度尼西亚的精英》（*The Modern Indonesian Elite*）。

② 斯迈思（H. H. Smythe）以及斯迈思（M. M. Smythe）：《尼日利亚的新精英》（*The New Nigerian Elite*）。

但是民族领袖并不都是知识分子或革命者,印度的情况就是如此。的确,受西方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国民代表大会并对其初期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是自由派,不是革命者,而且他们的影响也是短暂的。不久这种影响便遇到出身工商业或专门职业者家庭的政治领袖的挑战,更大的挑战则来自源于传统的宗教思想的甘地的道德思想和社会学说。

革命知识分子取得政权一般都是通过采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条,并且建立共产党或类似的组织实现的。这种政党或组织可以使他们同产业工人特别是贫苦农民紧密结合起来。雷蒙·阿宏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不发达国家中的号召力:“……凡是精英们由于保留了某些封建制度残余,或是由于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前进速度太慢因而无法胜任其职时,共产主义便可能成为一种进步的力量……在我们的时代,不能利用技术资源提高生活水平并增加社会财富的精英是失败的精英。很显然,一个政党,作为由于生产率的低下因而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应该站出来取代那些宁愿花钱购置豪华舒适的美国轿车而不愿购置拖拉机或机械设备的军人、银行家或大地主。”^①

下列情况也提高了共产主义的威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党拥有行之有效的“政治公式”(莫斯卡语)^②——即一种清晰地表明追求的目标并以道德上支持统治精英及其行动的纲领。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种进步的学说产生的;是一种与古代迷信针锋相对的现代世界观;一项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纲领,

^① 雷蒙·阿宏:“社会结构与统治阶级”,见《英国社会学报》,1950年,I(2),第135页。

^② 见莫斯卡原书第70页:“……统治阶级并不仅仅依靠对权力事实上的占有来证明其合法性,他们还试图为其找到道德和法律基础,将他们的统治作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学说和信仰的合乎逻辑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这种政治阶级的权力所依靠的法律和道德的基础,或曰原则,就是我们在其他场合称之为‘政治公式’的东西。”

这种纲领能够鼓动世界各地的人，特别是生活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国家的人；同时也是一种旨在加速工业化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激发人们行动和劳动的热情，而且通过苏联的经济增长证明了其分析的现实性和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工业革命的加尔文主义。然而，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并没有实现经济的充分发展。

如果现在我们来看看外部环境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在不发达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既遭到传统宗教思想家的反对，又遇到受西方自由思想熏陶的人的抵制。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印度。虽然那里的共产党如今已成为执政的国大党的主要反对派，但是在那里无论马克思主义或任何其他革命思想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在印度，在当代无神论的知识分子当中，绝少有人不断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或猛烈的抨击，或是倡导新的社会思想，鼓动群众起来行动。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的影响与新的中产阶级的影响十分相似，新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给社会风俗与趣味带来了某些缓慢的变化。世袭的知识精英的存在，即婆罗门——近代很多知识分子都源出于此——使得他们在很多方面仍然无法摆脱对传统社会的宗教和社会思想的依附。此外由于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和五花八门的宗教信仰的离心作用，来源于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更新（这种更新可能会逐渐削弱上述依附关系）至今仍未产生充满自信的现代知识分子阶级。也许同印度相比，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中的传统思想势力并不那么强大，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也不能那么尖锐，但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仍然可能是有限的，这是由于以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为政策基础的强大的统治精英的存在，或是由于知识分子因其西方文化的背景而曲高和寡，与群众相互隔绝造成的。在某些

地方,知识分子也许根本不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集团,因为他们人数有限、势单力薄,这时他们与某些西方国家中的知识分子的情况非常相似。然而无论知识分子的情况怎样千变万化——无论他们是革命领袖、是权力精英的批评者,还是埋头从事某种特殊的教育、行政、新闻等职业——他们在任何不发达国家中都是最重要的集团之一,因为这些国家目前迫切需要理论的纲领,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工业主义,而且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业已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无法失而复得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生存和发展。

很显然,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们在亚洲和非洲国家中形成了最重要的精英集团之一。在那里经济发展的动力最初来自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这些领袖人物可能是西方高等教育和激进的学生运动的产物,或者来自国内实业界和专门职业者的圈子,或者是传统精英集团的后裔,但是从权力来自政党的领导权方面看来他们彼此又是十分相像的。这种政党是建立在民族感情的基础之上,并为民族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产生于同外国统治者进行斗争并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也是获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所导致的结果,特别是需要在彼此联系又各自分离的部落或语区的基础上建立或巩固国家政权,并计划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发展的时候。由此人们便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某个成功地领导过独立运动的单一的政党是怎样把自己变成统治精英,并以昔日的功绩和将来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许诺为自己辩护的。

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是支持这些统治精英的唯一的“政治公式”(political formula)。其他的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或福利思想可能也包含在统治学说当中,就像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例如在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革命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在非洲,一方面,民族主义当中输入了社会主义学说,另

一方面，以明确的邦联(federation)计划的形式出现的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也给民族主义带来很大的影响。同样，在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当中，也有浓厚的社会主义的色彩；在中东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里，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社会主义也同样反对外国的经济利益。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来说，民族主义显得有点模棱两可，其原因之一是它已经有些过时，并且企望恢复传统习惯和传统精英的地位，在那些本身仍然保留着古代文明的国家里尤其如此。在独立运动的进程中，有一种文化冲突似乎是同政治斗争同步发展的。在这种文化冲突中，外国统治者的语言、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遭到抵制，而本国昔日的光荣与成就则备受推崇。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便是印度教在印度的复兴。甘地在组织反对英国统治的群众运动中不但利用而且向前发展了印度教。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在巴基斯坦，甚至在一些非洲国家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在上述地区伊斯兰教为反对殖民统治的人提供了集会的场所。^① 在民族主义以这种方法同古代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联系的地方，它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当其反对社会生活朝着全面合理化方向发展的时候。因此，尽管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拥有强大的力量——他们可以大张旗鼓地为争取独立的斗争举行纪念和宣传活动，他们具有建立强盛的民族以及将经济生活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的迫切愿望——但是，他们仍然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些困难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传统派和现代派在各个阶层和整个社会中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作为

^① 例如，一项对独立以前的塞内加尔的研究注意到：“传统政治首领的权力和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转移到了伊斯兰大教派的哈里发(Khalifas)的身上；后者今天代表了能够与现代精英抗衡的主要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现代精英和政治运动不得不与这种力量达成妥协。”见默西埃(P. Mercier)：《塞内加尔精英的演变》，引自《国际社会科学报》(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1956年第八期之三。

他们权威的基础的理论学说缺乏精确性和一致性；由于个人的行为不受传统行为准则或是行之有效的社会规范的严格约束，因之而出现的在一党制政府中极易产生的执政党领袖和官员中的腐败现象。

还有一种社会集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尚未提及，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里，该集团比知识分子或政治领袖人物具有更大的影响，这就是军官集团。显然，在新独立的国家当中，当政治机构尚未形成，政权还不稳定之时，那些直接握有生杀大权的人便有了在决定国家未来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机会。他们是否能够干预政治事务取决于许多因素：军官们在学校中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他们的社会背景、他们对所指挥部队影响力的大小，以及另一方面政治领袖的力量及他们与军事首领们关系的性质。^① 过去在拉美国家中曾发生过一些军事干预政治的例子，但与目前的情况关系不大，而且主要发生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之前。拥有武装的 *caudillos* (军事首领) 很像封建贵族，他们在某个业已建立的政权垮台之时采取行动，这不像我们正在讨论的致力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精英人物。^② 当然，这是军事首领们有朝一日重新上台的方式之一，不过目前还存在其他一些提高他们重要地位的因素。最近一位作者注意到至少在八个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军事领导人已成为最重要的集团，并且认为应该考虑在发展中国家里军队的政治作用：“……首先，应考虑军队参政在组织结构松散的传统国家已经成了人为造成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其次，应考虑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中，这样的军队在以

^① 对于有关因素的一般讨论见芬纳(S. E. Finer)的《马背上的人》(*The Man on Horseback*)，特别是其中涉及不发达国家的第八章和第九章。

^② 列文(Edwin Lieuwen):《拉丁美洲的军队与政治》(*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第一部分。

创造性的态度对待现代化时所能扮演的角色。”^① 正如他所指出的，军队在不发达国家中是最现代化的因素之一，并受到“迅速地开展技术革新的精神”的鼓舞。与此同时，它们对于整个社会具有重要的现代化影响。因为它们用现代技术训练士兵并反复灌输以新的面貌投入工作的思想。

这种新型军队还有一个特点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这就是它们提供了一条跻身上流社会的最有效的途径。在那些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提供主要政治领袖的国家中，——例如许多中东国家——军队为来自社会中层的人组成新的精英，以及充实精英队伍提供了机会，并经常同农民、工人联合在一起为提高自身政治地位而斗争。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革命是由主要来自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年轻军官所领导的。同样，在本世纪的拉丁美洲，军队对政治的干预已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它已不再是那种代表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利益的军事首领在一场分裂斗争中争权夺利的形式了，已经出现了由年轻军官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正如列文(Lieuwen)所说：“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二十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的革命采取的是激烈变革的方式……其大致轮廓是雄心勃勃但又怀才不遇的年轻军官和起义民众一起投入共同的事业。他们联合一致用暴力摧毁了旧政权(ancien régime)。”^②

从上面对不发达国家情况的简短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存在着几个精英集团：革命知识分子、民族主

^① 派伊(Lucian W. Pye)：“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军队”，见《欧洲社会学报》，1961年第二期，第83页。

^② 列文(Edwin Lieuwen)：《拉丁美洲的军队与政治》(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第一部分。

见①，第132页，所列举的例子是1936年的玻利维亚(Bolivia)，1944年的危地马拉，1943年的阿根廷以及1953年的哥伦比亚。

义政治领袖以及军官。其他集团,例如政府官员和实业家,在领导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也具有相当的影响。是什么因素决定这些集团中谁能取得领导地位呢?在某些情况下,在拉美和中东,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所有者和实业家精英们在确立了自身地位之后便很难被赶走,尽管他们的统治软弱无力并且阻碍经济的发展。由于拉丁美洲的军事统治传统,或是由于伊斯兰国家并不强调军事和政治功能的分离的文化传统,军事干预在某些国家可能受到欢迎;但是在军队中立的理论盛行的国家中,例如在那些曾受英国统治的国家中,军队干预则遭到反对。

精英通过工会、农民组织和群众政治组织建立起与普通民众的密切联系,以便表达人民的愿望并为他们谋利益,这是这些国家的成功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也标志着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与早期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的区别。至少到十九世纪中叶,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新的精英人物还无需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便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并开展夺权斗争,或者无需向群众展示他们的目的或成就便可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在当代不发达国家中,对群众支持的需要大半是为了仿照那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的榜样。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经济发展已变成人们明确意识到并自觉追求的目标。我们可以通过表明马克思主义绝非二十世纪工业革命的加尔文主义来指出这种区别。如果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解释,加尔文主义是技术时代的教义,它通过反复宣传经常的勤奋工作的价值和节俭、禁欲的意义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科学,同时又是社会和政治的教条,它勾勒出人类社会未来的前景并制定出实现这种远景的行动纲领。但是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以一种极为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示了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所有不发达国家用以制定计划和政策的学说都采纳了一种理想社会的概念——无阶级

社会，福利国家，彼此合作以及共同的财富——这里面的内容已远远超过了工业化经济的成份，尽管发展工业仍然是到达理想社会的主要前提。因此，各种精英能否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能否成功地激发群众的热情，能否从贫苦农民和产业工人这样的主要社会阶级中获得足够的支持。

精英们采用各种方式争取这种支持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政治和社会发展活动，这些方式包括建立群众的政党、组织农业合作以及实施社会发展计划。不过困难依然存在：在许多不发达国家当中，由于精英们所受的西方教育、由于他们出身于地主、实业家以及部落酋长这样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加上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同群众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上述情况导致某些统治精英滥用权力的危险，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统治者滥用权力已习惯于逆来顺受的时候。与此同时，较小的精英集团先天具有的、或后天获得的优势通过排挤和抵制来自传统上俯首贴耳的社会下层的人的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按计划使经济增长的努力。我们在若干国家特别是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中可以发现这方面的例子。这些国家吸引大众参加发展建设的努力勉强获得了成功^①，但是上层社会财力雄厚的地主们仍具有绝对影响。尽管如此，社会发展仍然为下层社会集团提供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也为出身低微的人挤身高级官员的行列创造了条件，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而且还可以使他们获得从政的经验。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教育的发展也提供了类似的机会。很有可能正是由于教育的发展以及先进的工业国家所提供的榜样，激起了普通百姓的雄心壮志。

^① 见联合国研究报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曼谷1960年。

尽管在不发达国家中精英集团,甚至领导者个人声名显赫——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与普通百姓鲜明对照的结果——但是归根结蒂,单凭这些精英和领袖的行动远不足以决定他们所参加的发展进程的形式并使这种发展获得成功。当然,精英和领袖人物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这远不够。他们还必须真正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阶级的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当前这些阶级正为摆脱他们世代所受的贫穷困苦,逆来顺受的生活而斗争。

第六章 民主与多元化精英

莫斯卡与帕雷多在精英理论中创立了政治学中的民主理论。对这种理论的批评始于这样一种观点：在一切社会中都存在着进行有效统治的少数人。正如莫斯卡本人所看到的，当他表示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允许精英自由形成，并且在精英当中建立正常的、旨在获得权力的竞争，因而表明他承认统治精英在一切社会中都是必要的这样一个事实时，对他的批评也就接踵而来了。这种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民主的概念——在这种政治制度中各政党都在争夺群众的选票——进一步表明精英是相对“开放”的，而且其更新替代是建立在个人功过基础上的（即精英的流动是在广泛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的），还表明从大众至少可以在相互竞争的精英中进行选择的意义上说，他们是能够参政的。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卡尔·曼海姆最初将精英理论同法西斯主义以及反唯理智论的“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的学说联系起来，但后来他又认为：“……政策的实际形成掌握在精英的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就不存在民主了。因为虽然作为个人的公民不能自始至终一直参与政府事务当中，但他们至少有可能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愿望，这已经足够民主了……从强调政权一直把持在少数人（精英）手中说，帕雷多是正确的，而且我们也可以接受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关于政权统治具有向党派的寡头统治（oligarchic rule）发展趋势的规律。但是，过高地估计这种精英在民

主国家中的稳定性或他们任意运用权力的能力则是错误的。在民主国家中,被统治者总是可以采取行动替换领导人员或迫使他的作出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决策。”^① 曼海姆还强调了根据功过选择精英,和建立精英统治同民主政府之间的协调,以缩短精英与群众间的距离的重要性:“我们假定民主不是以去掉所有精英阶层,而是以一种新型的精英选择方式和精英的一种新的自我表现方式为特征的……在民主化过程中变化最大的是精英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民主精英具有群众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对群众具有意义的原因。”^②

精英思想和民主政府的观点在二十世纪里加快了彼此协调的步伐,曼海姆本人的著述已是证明,同时一些有利的条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条件之一就是领导权的重要性普遍得到提高,这是大规模战争,国际间经济增长的竞争和新的国家的崛起及发展的结果;所有这些使人们忘掉了精英统治的危险,转而考虑才华出众、有胆有识的精英的必要性。另一种对民主的竞争方式有利的情况是一党制国家的精英统治的结果和存在的几个政党竞争权力的民主国家的经历之间的对照。这些政党都不希望带来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此外,通过这种方式的精神带到自由经营制度中的经济行为方式中,通过精确地分析政治行为(如果说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粗略而有限的话)所看到的这种方式将会带来的前景,使它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对此熊彼特表述得非常清楚^③,他还认为,在较为普遍的意义上说,近代民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起诞生的,并且二者具有因果关

① 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文集》(*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第179页。

② 同上,第200页。

③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第二十二章:“另一种民主理论”。并见上文第16页。

系。^① 熊彼特引用一位成功的政治家简洁地转达了这种观点的话说：“实业家们所不明白的是我用他们对付石油时所用的同样办法来对付选票。”^② 最近，唐斯(A. Downs)在“民主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中详细地介绍了政党之间竞争选票的这种民主概念，他是这样归纳他的观点的：“我们主要的论点是民主政治中的党派就像唯利是图的经济事业当中的企业家。只要能达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可以制定任何他们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选票的政策，这就像出于同样原因，企业家愿意制造任何他们相信可以牟取暴利的产品一样。”^③ 还可以在将竞赛理论运用于政治行为的尝试中找到使用这种方式的例子：即将在分析经济企业的行为时所广泛采用的数学计划运用于政党活动。^④

但是并非唯有政党间的竞争起到了协调精英与民主之间关系的作用。这种观点的提倡者在多数精英当中发现了一个作为民主制国家的标志的制约和平衡系统。对此，雷蒙·阿宏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明确指出：“……虽然到处都有企业经理、政府官员、工会秘书和部长，但是这些人员的更新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以相同的方式完成的，他们要么形成统一的整体，要么仍处于彼此有别的状态。苏联式的社会与西方类型的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前者的精英是统一的，而后者的精英则是分裂的。在苏联，工会书记、企业经理以及高级官员一般都属于共产党……而

① 同上，第 296-297 页。

② 第 285 页。

③ A. 唐斯：《关于民主的一种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第 295-296 页。

④ 然而，到目前为止，竞赛理论最广泛地应用于研究国际冲突方面，特别是在时下流行的“战争竞争”当中。雷蒙·阿宏在《各国间的和平与战争》(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中详尽考察了该理论在这一领域中的使用。注意该书最后一章：“合理的战略与合理的政治”(Strategie rationnelle et politique raisonnée)，第 751-770 页。

另一方面,在民主国家——我宁愿称之为多元化社会(pluralistic societies)——当中,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工会领袖和政治家之间都充满了公开的争斗。因为都有资格建立五花八门的协会以及各种专业和非专业组织,因而每一个组织都以极大的热情捍卫其成员的利益。政府变成了协调工具。当权者非常明白自己的地位极为不稳。他们处事周全,必须兼顾反对派的利益,因为他们自己就曾经是,并且有朝一日仍将是反对派。”^①

作为精英之间竞争的民主的概念可能会招致各种批评——过于武断,而且不考虑它所定义的现象的一些人们普遍承认的特点;包含这种定义的理论缺乏精确性而且与现实不符;或者它是建立在遭到其他价值标准反对的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当代民主往往被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定义为人民大众参与政府工作,其中一条古老的公式便是林肯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说中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有的精英理论都否认民治政府有任何现实意义。^②例如在帕雷多和莫斯卡的某些一般评论中可以看到这种否定态度;在过去所有已知的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都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或者从米歇尔斯、曼海姆和阿宏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有关的理论分析,这些分析力图表明在任何大规模的包罗万象的社会(以及在社会中任何大型的、复杂的团体)中都只有代表性的民主,没有直接的民主,而且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的代表们只是少数,因为被代表者的影响仅限于每隔较长一段时期评价一下代表们的活动。但是对这种分析也有一些反对的观点。首先,根据我们目

^① 雷蒙·阿宏:“社会结构与统治阶级”,见《英国社会学报》(*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1),第10页。

^② 在上述引文中,雷蒙·阿宏表示:“社会政府不大可能不是由少数人领导,而是处于随便什么人的控制之下……民事政府是存在的,但并不存在什么民治政府。”

前考虑的民主的观点，代议制政体显然是一种不完善的民主体制，因为它将很多人排除在政府之外。当代表的原则被用于间接选举制度时，代表制政府的非民主的特点暴露无遗。这时是当选的精英本身去选举另一种精英，使其具有相同的或更高的政治权力。反对公众统治的人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便是一例，德·托克维尔等人从中看到了限制民主的有效手段。即使民主即为精英竞争这样一种思想的捍卫者不竭力宣扬这种观点以反对其他意义的民主——如群众参政，对此德·托克维尔、帕雷多、莫斯卡以及加西特(Ortega y Gasset)都表示惋惜——他们仍然倾向于将代议制政体视为理想的类型，而不是据此反对人民直接参与立法、行政工作的理想，他们还在寻找能够更加靠近这一目标的手段。

上述争论又引起了第二种反对民主分析的意见，这种意见来自熊彼特、阿宏等人。据他们解释，民主是某种业已获得的、完全的东西。它与其他政治制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另一方面，在流行于差不多整个十九世纪的民主即为民治政府的概念中，民主被看作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过去曾被剥夺的政治权利，对决定社会政策的影响力被不断扩展到人口的各个集团当中。这意味着下面两种情况：首先，民主主要是社会下层阶级反对官僚和有产阶级的学说和政治运动（当然这是促使精英理论作出反应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民主被视为以开创人们将成为自己的主人的理想的社会环境为目的运动，这也许永远也无法彻底实现，但民主主义者却应该为之奋斗。十九世纪的民主政治思想家将不会把今天的普选权、政党间的相互竞争以及代议制政府作为民主进程的终点，无论这些在同其他政治制度相比之下具有多大价值，而继续向前冒险是不可能的。

在精英的统治受到周期性选举的抵制的二十世纪，静态的/固定的/民主概念出现的原因应该到本世纪的政治环境当中去

寻找。正是由于一党制国家的出现——无论是采取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形式,还是以苏联的共产党的形式——才使得多党制和代议制的民主的威望得到提高。在我前面引用的雷蒙·阿宏的论述中所提到的,苏联式的社会中统一的精英与西方类型的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精英形成的鲜明对比正好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们或许会问,是否有组织的政党——或者范围更加广泛的有组织的精英集团——对于政府的民主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或足够的。人们往往认为它们不是必要的,并且认为同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比,在权力更加分散的政治制度中,挑选政治领导人的任务暂时可以由一些同当今的政党相比,组织不那么严密,官僚色彩不那么强烈,存在时间也不那么长久的社团去完成。对此还应补充的一点是,在消灭了社会阶级的社会中(许多思想家将这一点看作是民主发展的结果),作为政党产生的唯一最重要的基础也将随之消失;虽然无法得知产生政党的其他的社会特征,但是很难相信这类政党在政治生活中会具有和我们所熟悉的政党一样的规模和影响。人们将会注意到这一论点,指的是不存在任何政党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指一党制政权。后者与民主毫不相干,因为它通过执政党剥夺了个人对重大的社会决策表达任何不同意见或使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因为他没有任何自治的、强大社团形式的讲坛以发表个人意见或听取他人的见解。很有可能在群众热情高涨的时期,某一单独的政党的确表达了该国大多数人的愿望,并且成功地吸引广大人民自愿参加立法和行政工作,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该党也就没有必要镇压仍然幸存的其他政党了。还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战争、迅速工业化或者在前殖民地疆域内建立新的国家的需要为单一政党的统治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这并不能使该党在政权中发挥民主的作用。如果能够找到必要性,执政党可以被看作是民享政府,但是人民仍没有实现民治的机会。

关于政党对于民主制政府来说是否必要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将是纯理论性的。更加简单同时也更为实际的方式是考虑政党与精英之间的竞争是否足以确保民主。今天的许多自由派思想家认为这种竞争足以确保民主，或者至少认为精英之间的竞争非常重要，就是将来民主的条件当中也不能缺少这一点。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卡尔·曼海姆的支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宣称使社会变得民主的唯一条件是个人应该“至少有可能每隔一段时间便让人感到他们的愿望”。^① 另一方面，熊彼特和阿宏都注意到了其他一些对政治制度的影响。他明确表达了他称之为“民主方法成功的条件”。他用四个标题对这些条件进行分类：一、政治中的人的材料（即精英）应该是优质的；二、政治决策的有效范围不应太广；三、政府应该领导具有良好标准与传统的、训练有素的官僚的服务；以及四、应该有民主的自我控制，即参与竞争的精英应该容忍对方的统治，并且应该反对欺骗行为，而选民在作出选择之后应避免往常干预其代表的政治活动。与此相似的是，在我们前面所引用的文章中，阿宏也论述了当代各民主国家成功的三个条件：一、恢复政府调解各集团间冲突以及为全社会共同利益作出必要决定的职能；二、能够保持灵活性并恢复刺激的有效的经济管理；以及三、限制打算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个人和集团的影响。毫无疑问，这些观点仍然属于将民主视为精英间的彼此竞争的思想，并继续探索其新的内涵，同时否认影响广义民主的成败与范围的许多其他因素。这里我们将首先考察其他一些政治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例如曼海姆就是这样认为的，尽管这与他们列举的民主的条件并不十分相符——民主政体的发展除了要求精英间的彼此竞争之外，还要求在自

^① 尽管他们有时前后矛盾地将平等的发展以及精英与群众间距离的缩小作为当代民主发展的因素加以讨论。

我观念和与他人的关系方面改变精英的结构和组成。简言之，在民主国家中，个人在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应该有更加迅速、更加广泛的流动，在整个人口中应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精英；精英身上的“贵族”色彩应该越来越少，并感到他们本身与群众是密不可分的；而且作为各种影响的结果，他们的生活方式将真正接近普通群众的生活方式。这里面的前两个条件将使相当数量的人就像经历被统治的体验一样也体验到统治的经历；其他条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治统治的特点，使它不再那么威严、显赫，不再那么可望而不可即，或者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情况，我们将会发现，虽然存在着良好的竞争型的民主，但在其他的条件方面都有所不足：精英的流动速度并不够快，而且精英的补充仍然主要来自社会的上层阶级^①；精英的外貌变化很小，并且由于其补充主要来自上流社会，由于精英理论本身，以及由于流行的“向上爬”(getting on)和进入“最高层”的社会学说，使得关于精英的功能的旧的贵族观点仍然存在；最后，西方国家各种条件的水平上升如此缓慢以至使统治者在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处于高高在上的位置。还应注意随着处于精英竞争的舞台中心的政党变成群众性的党派，它已失去某些民主的性质。它们往往很难变成米歇尔所预见的寡头政治组织^②，但是却容易为组织内的官员所左右，因而组织内的普通成员很难对决策施加影响。

除了上述政治因素之外，我们还应考虑是否还存在着民主政府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社会条件。目前的精英理论的

① 同上所引阿宏的著作中第三章，同时参见哥茨曼(W. L. Guttsman)的《英国政治精英》(*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中第十一章，其中表明了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够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过程。英国有一个主要来自上流社会的“优秀人物”集团(group of the good and the great)，人数最多仅几千人，他们参加咨询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以及类似的公共机构的工作。

② 米歇尔(Robert Michels):《政党》(*Political Parties*)。

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在将民主仅仅定义为全社会的一种政府的形式(form of government of a whole society)，因而从概念上排除了诸如“社会民主”或“工业民主”等观点中的任何非政治因素之后，这些理论进而取消了对这种因素可能会对政府本身的形式造成影响的考虑。但这实际上是忽略或者干脆拒绝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即存在于社会不同领域中的各种组织不仅仅是共存的，而是通过彼此协调或矛盾关系相系联系并且相互影响的。这是由马克思在批判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家时所提出的令人敬佩的观点，他认为把作为公民的人(即享有政治权利的个人)同作为文明社会成员的人(即参与家庭生活和经济生产的个人)截然分开是极其错误的。^① 我们应该认为许多社会学家连篇累牍地加以描述的，同十九世纪相比其成员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来更具有合作性、更少权威性质的西方社会中的现代民主家庭的形成没有受到政府民主思想的影响；或当其一且存在之后对于维持和发展政府的民主态度和民主实践没有重要影响吗？当在生活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工作和经济生产——当中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积极参与对其生活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决策的机会时，难道我们还认为这种本应要求个人作出独立判断并积极参与重大社会问题决策的民主政府能够兴旺发达吗？我并不认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唯唯诺诺、俯首贴耳的环境中的人会养成政治民主所号召的慎重选择和自治的习惯。的确，在西方国家中，个人对工作的依附关系在某些方面已有所改善：工人可以通过工会和刚刚开始建立的联合咨询机构对其工作条件的改善施加影响，同时闲暇时间的增加也扩大了他自己决定事物的范围。另一方面，今天许多工作分工更细，重复性增加，结果尽管工人不是以传统的方式受制于雇主，仍然发现更难找到机会

^① 卡尔·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

在工作中独立作出判断,运用想像或发挥技能。^①

还有一些经常被讨论到的情况也影响了民主政府的实践。财产和收入的巨大差别明显影响了个人参与社会统治活动的程度。一位富人可能在进入天国时会遇到麻烦,但他会发现进入政党的高级委员会或某些政府部门是轻而易举的事。他还可以用其他方式对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控制新闻机构、结交政界名流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压力集团或咨询机构。而上述这些优势穷人则一无所有:他与有权有势的人没有关系,他没有多余的时间或精力投身于政治活动,他也没有机会获得政治方面的系统知识。这种由经济的不平等造成的差别又被教育程度的不同加以扩大。在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中,为提供主要的社会统治者的阶级所安排的教育同为数量占多数的被统治阶级所提供的教育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② 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不仅巩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它还通过强调为精英集团选择杰出的人物以及高收入者和学术成就的地位使整个精英统治的理论不断繁荣发展,而不是提高可以使大多数公民参与政府工作的普遍的教育水平。我所提到的财产和教育差别是使社会分为不同阶级的部分原因,正是这种基本的差别在“社会民主”理论

^① 关于这类问题可见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的《工作之分析》(*The Anatomy of Work*)。

^② 在英国,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后代的典型职业可表述如下:下层社会的子弟在重要的公学和牛津、剑桥接受教育,然后经商、从政、进入文官中的行政阶层或者从事较为古老的专业;工人阶级的后代进国立学校——主要是现代中学——受教育,然后在十五岁时开始从事工业中的体力劳动,或者去作小职员。尽管其中有些人(同二十五年前相比,今天的比例已经较高了)进入中等学校并有可能进入各地的大学或工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两种阶级中都有可能有些后代逃避他们自身的命运。但这种比例很小,无关大局。美国的教育情况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大相径庭,而且发展较快,尽管有些变化只是近年的事;在美国有很大比例的大约占百分之九十)来自各阶级的同龄的孩子进入中学,一直读到十七岁。然后仍有相当比例的人(约占百分之三十五)继续学习大学课程。

中经常被认为与民主政府很不相称。我在下一章中将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所列举的反对关于精英的民主理论的观点是建立在“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这种民主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另外一些反对意见则是由于精英理论本身前后矛盾造成的。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精英之间一直处于对立冲突状态并且精英的流动频繁进行的话，那么是否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能够长久维持下去。曼海姆在论述三十年代初德国背景下的政治民主问题，认为民主的发展意味着统治精英的减少，并进而表示：“当代民主经常遭到破坏，因为与拥有比较统一的统治集团早期民主(或前民主)国家相比，当代民主承受了过多的错综复杂的棘手问题。”^① T. S. 艾略特(T. S. Eliot)在《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on of Culture)中也以类似的口吻谈到需要定期更换成员的精英是无法像早期的统治阶级那样长久保持其社会地位的。^② 然而，上述两位作者都夸大了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危险性，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流动，而且精英之间也并没有发生规律性的尖锐冲突，正如阿宏在讨论当前西方国家的状况时所说的那样：“统治精英的构成可能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变化，精英中各种集团的重要性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这些集团只有彼此合作，社会才得以生存并走向繁荣。精英当

① 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文集》。

② T. S. 艾略特：《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艾略特批评了曼海姆关于现代社会中的精英照样能够发挥早期统治阶级的作用的观点，但却没有注意到曼海姆本人已经对此提出了批评。实际上，看起来曼海姆一直也没有形成一个关于精英在当代社会中位置的固定的观点。有时候他认为精英间的竞争是民主的保障；有时他又提倡知识分子组成的单独的精英集团进行统治；最后也又认为没有什么精英或精英集团能够确保政治稳定，除非它们具有统治阶级的特征，很可能这要通过与现存的上层阶级结盟并且变成拥有财产的、世袭的集团才能做到。曼海姆唯一始终否认的观点就是无阶级的平等社会的观点。

中对基本问题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观点和行动的统一。”^①实际上这种观点和行动的统一——以及艾略特所期待的社会持久性——在西方国家中已经通过来自社会上层的精英的更新,通过在意识形态方面对精英理论本身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而且这种观点也是正确的:“有人刚刚降生身上就带有被统治的印记,有人则命中注定要成为统治者。”^②在西方社会中,精英往往站在因阶级划分所形成的巨大屏障的一边。因此,如果我们只注意精英之间的竞争,而不去考察阶级冲突和精英与社会各阶级联系的方式的话,我们将对政治生活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民主主要是靠平衡和限制对方的权力的精英之间的竞争而得以保护和维系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如果我们从这一命题出发去观察精英理论家的辩论,我们便会发现另一个前后有出入的地方。这就是在争论的不同阶段,关于多种精英的概念变成了各种自发的社团的观点。例如莫斯卡就提到了民主制度下许多不同的“社会力量”(而非精英)参与政治生活并限制其他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官僚集团的可能性。阿宏在强调多元化民主国家中权力分散的重要性时,并未仅仅涉及他所划分的主要的精英,他还提到了多种专业集团和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存在于这种社会当中并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但是仅靠宣扬这种蓬勃发展的组织是真正民主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的方式并不能起到支持精英理论的作用。因为在强调活跃的地方政府、专业团体和其他自发及自治的社团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认为这些组织属于重要从事夺权斗争的精英的范畴,而是认为它们为普通男女学习和实践自治提供了机会和场所。它们是大千世界

① 雷蒙·阿宏:“社会结构与统治阶级”,引自《英国社会学报》,1(2),第129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Politics)。

中使民治政府更加有效的手段。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前面所表述过的观点，政府民主制度的维系，特别是其发展和改善并不取决于对普通人无法控制的精英集团之间竞争的保护，而在于创造使大多数公民，即使不是全体，能够参与社会问题决策的条件。这些社会问题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与工作、社区和全国有关的问题——并以最大限度地缩小精英与群众间的差别创造了条件，这种观点表明：首先，应当寻找扩大自治范围的机会，特别是在经济生产领域。在经济生产领域中，尽管遇到了不少困难，但还是进行了值得认真注意的诸如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和印度的社会发展计划这样一些现代实验；其次，应该采取某种方式克服自发的社团——这些社团主要是由于社会阶级的差别而产生的，并且明显受到了作为其领导者的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控制——全面参与政府工作的障碍。

第七章 要平等还是要精英?

民主的含义之一是：人们之间应该有某种实质性的平等，这一种平等应该体现在以下方面：应尽量使成年的社会成员对有关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的决策平等地发挥影响；不应过分强调财产、地位，以及教育、学识等方面的不平等，致使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中某些人永远成为他人的附庸，或者在实际运用政治权利时造成极端不平等的状况。提倡平等的人还不至愚蠢到宣扬人们在体力、智力以及性格诸方面都必须完全相同的程度。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其他一些观点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有三点考虑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尽管人们各自的特点千差万别，但人类在某些基本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有类似的体力、情感和智力方面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营养学、精神健康及康复的科学得以产生以及开展儿童教育的原因。除此之外，个人之间差异相对说来是有限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中等的水平上。如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人类当中有种类的区别，而不是程度上的差异；如果一极是野兽，而另一极是天使——那么对平等思想事实上的支持也就荡然无存了。

第二点是个人特点的差异与社会地位的区别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很久以前，卢梭就作过这种重要的划分：“我认为在人类中存在着两种不平等的状况：其一，我称之为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这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由年龄、健康状况、体力，以及思想或灵魂的质量诸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其二可称之为

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建立在某种习俗的基础上的，至少是经由人类的许可得以形成的。这种不平等是由某些人所享有的各种特权组成的，这些特权就是那些财力雄厚、有权有势的人的特权。”^① 我们无法确认在到目前为止的大部分社会中，这两种不平等之间的联系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精英流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认为这两种不平等是彼此相关的：认为在所有社会中才华出众的人都会成功进入精英圈子，或形成日后自然而然占主导地位的精英集团。不过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对这一命题有利的史实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被普遍认为具有特殊的社会流动性的）当代社会所提供的大量事实也未能对此加以证实。社会中主要的不平等现象是由财产和继承权等方面的制度所建立并维持的政治和军事权力造成的社会结果，这种政治和军事权力得到了特定的观念和学说的支持，尽管它们并不完全反对那些杰出人物的野心和欲望。

上述考虑使我不得不提出关于平等的性质的第三点。假如无论是不平等抑或平等都不是自然现象，人们仅仅对此加以接受，那么提倡平等或不平等就不属于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科学论点的范畴，而属于道德和社会的理想的公式的范畴了。我们可以选择平等，尽管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与这种理想的可行性和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适当的手段有关的事实，最终肯定我们这种选择的不是事实而是认为追求平等有可能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理性的主张。在使用“我们”这个词时我所特指的是生活在二十世纪社会中的人；因为经济生活不稳定、缺乏有效的通讯手段、教育的不完善和对社会结构和个人特点一无所知等方面的因素，使人难于对早期社会的稳定和持久的平等形式形成明确概念。二十世纪开天辟地第一次使人能够根据愿望

^①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Everyman 版，第 160 页。

改变社会生活；而这也是既让人满怀希望又令人感到恐惧的原因。

这里我并不想列举平等的精神方面的原因和目的^①，而是要考虑困扰寻求平等过程的社会政治问题，以及精英理论为反对平等所提出的批评。如果首先从考察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的观点入手将会比较容易一些，因为这一观点是以一种当代社会更能普遍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因为它是各种精英理论本身作为对立面应运而生的主要根源。众所周知，马克思并没有为他所展望的社会主义社会绘制蓝图^②；然而人们却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他在有关未来社会主义的文章中所大致勾勒出的这一社会的显著特征。马克思对无阶级社会的描述综合了道德的、社会学的以及历史的成份。在他早期的手稿，特别是《1844年经济和哲学手稿》中^③他对道德方面有详尽的论述，但这决不意味着否认他后来的文章。^④在这里无阶级社会被定义为一种人们能够对个人命运具有重大的、平等的支配的社会；一种人们从自己创造的国家、官僚、资本和技术的暴政和控制下解放出来的社会；一种充满创造性而不是占有欲的社会；一种人们从与他人的社会合作中享受乐趣，得到帮助而不是在与别人的竞争中相互仇视、彼此嫉妒的社会。马克思没有一直对获得这种社

① 托尼(R. H. Tawney)在《平等》(Equality)中对此有令人惊叹的论述。

② 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往往利用这一点来反对他，而不是把这点看成是他的精明之处，看成是对即使是处在阶级社会的种种限制之下的人类的创造力充满信心的表现。在消除了这些限制之后，这种创造力将很容易发挥出来。

③ 见巴特摩尔(T. B. Bottomore)所编的《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④ 见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除劳动分工的有害影响所使用的手段的讨论，以及《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人类自由的论述；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完全民主的自治政府机构的赞扬；以及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的评论。

会条件的可能性抱乐观态度^①，但他却始终将其作为一种理想。他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如何实现个人自决的观点。首先，个人必须从其所属阶级和职业中解放出来，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某一阶级所形成的、由其反对第三者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公社关系一直是一种共同体，是这些人作为一般的个体所属的，只有当他们的阶级存在他们才得以生存的共同体。这是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加入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对于控制了自身和社会其他成员生存的条件的人的无产者的共同体来说，情况正好相反，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这个共同体的。正是这种个人之间的联合（当然，假定已经有了高水平的现代生产力）产生了由个人自我支配的自由发展和自由行动的条件，过去曾被错过的、曾在反对个人分散的基础上独立存在的条件。”其次，个人必须从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不负责任的政府和行政机构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马克思列举巴黎公社作为实例。在巴黎公社中，政府的职能是由通过普选产生认真负责并可随时撤换的市政委员所行使的，而且公社社员从上到下都只领取一般工人的工资。

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概念中的社会学因素可以从他关于社会阶级制度——生产工具的占有者与无产者的划分——以及更加本质的社会劳动分工特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划分中孕育着不平等的因素的推论中找到。只有消灭阶级，限制分工，才能获得平等。马克思一贯强调后一个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以一种颇具浪漫色彩的方式写道：“……一俟分工出

^① 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有关人类自由的章节中，马克思宣称“在任何可能的生产方式下”经济生产领域是一个必要的领域。“实际上，只有当由需要和外在规定决定的劳动消失之后，自由的领域才真正展开；因此，这种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处于真正的物质生产范围之外的。”

现,每个人就有了特殊的、独自活动的领域,这给他造成无法摆脱的压力。他成了猎手、渔夫、牧人、或者吹毛求疵的批评家^①,如果 he 不想失去生计,他就不得不一直这样干下去;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人具有独自活动的领域,每个人都能在他所希望的领域中取得卓越成就,整个生产是由社会调节的,这就使我每天从事不同的工作成为可能,我可以清晨狩猎、午后捕鱼、黄昏放牧,然后在晚间撰写评论,一切随心所欲,不必变成专门的猎手、渔夫、牧人或批评家。”但是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用更加现实的字眼表述了这一想法:“……今天从事具体工作的工人,受到限制的个人,某一特定社会职能的承受者将被全面发展的个人所取代,他所从事的社会职能将只不过是活动的各种不同的选择方式。朝着影响这种革命已经自然迈出的一步是技术和农业学校以及职业专科教育学校(écoles d'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的建立。在这些学校中,工人的子女受到技术方面以及实际掌握各种劳动工具方面的指导……毫无疑问,当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时……技术指导,无论在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都将在工人阶级的学校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因此,马克思的观点就像反对阶级的观点一样,是反对职能精英的观点的——即使精英的更新和补充是建立在个人才干的基础上的。劳动分工,以及最重要的从事脑力劳动和制订计划的人与仅仅从事必需的体力劳动的人之间的区别,扩大了阶级差别,并将个人限制在他自己选择,但又无法施展全部才干的某一生活领域当中。

马克思观点中的历史因素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主要能够应用于西方文明范围内的历史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统治与奴役的形式——主人与奴隶、封建领主与农奴、

^① 这里马克思指的是那些将经过修正的黑格尔哲学称之为“批判性的批判主义”(critical criticism)。

工业资本家与工人——形成了一个以逐渐意识到个人的素质与其作为某一社会阶层成员的身份之间的对比为特征的系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个人的私生活同由某一劳动分工的领域及其条件所决定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差别……在等级制度(特别是在部落)中这种情况仍未被察觉,例如,贵族永远是贵族,普通百姓则永远是普通百姓,无论他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何,也不问他的个人秉赋与才干怎样。个人的本性同具有阶级属性的、与个人的生活条件有关的非本质的特点之间的区别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这种区别本身是资产阶级的产物……无产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本性和劳动强加给他的生活条件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从年轻时起就一直是牺牲品,他没有机会在本阶级中获得那些能使他变成另一个阶级的成员的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给这个历史系列加上一个词语: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将不再有任何个人秉性和他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尖锐的差别,每一个人都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能,而且只受到那些作为自然人所遇到的限制,即他不得不生产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并且难以避免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其次,马克思将无阶级社会视为只有到资本主义业已充分发展的历史时刻才能实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使一个附属阶级——无产者——第一次出现,其本身并不包含未来的社会差别的因素。当无产者通过剥夺工业资本家并获得解放后,它将建立体现其团结统一的新的社会制度并防止社会中新的特权集团的产生。

在当代平等的倡导者中很少有人反对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的道德理想;但是他们会将马克思用以解释该社会到来的方式及特征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还会反对过去一直是正统的对无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近年来这

种解释已有所变化),这种正统的解释已经降到了用术语描绘没有工业私有制的状况的水平。对马克思本人的解释的主要反对观点一般指责这种解释将无阶级社会——完全平等、完全自由的社会——的实现描绘成一种一劳永逸的现象:一方面人们仍然生活在自私自利、人欲横流、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另一方面,古老历史已走到尽头,人们正在创立无阶级社会的新的制度。这对马克思未免有些不够公平,因为他允许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术语表达的——并允许存在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级”过渡的阶段。(《哥达纲领批判》)但是从下列意义上考虑,上面的批评是公允的:马克思并未考虑到在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中,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新的社会差别和新的统治阶级的可能性。这就是精英理论家、特别是米歇尔^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抨击之处。雷蒙·阿宏这样描述无阶级社会:“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这样一小部分人,他们实际上管理工业,指挥军队,决定国家财政用于节约或投资的比例并确定报酬的大小。这些人拥有极大的权力,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政治统治者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因为他们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于一身……政治领袖、工会领导、政界官僚、军队将领和企业经理都属于同一政党,并且都是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所有中间机构,所有个人的组织,特别是专业集团,事实上都受制于精英的代表,或曰国家的代表……无阶级社会使人口中的大多数失去了反对精英的手段。”^②

阿宏还考虑了另一种反对意见,即苏联社会的清晰的图景使无阶级社会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他承认“一种不同的无阶级社会的类型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然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其他

^① 参见《政党》(Political Parties),第六部分,第二章。

^② 引自《英国社会学报》,I(2),第131页。

类型的无产阶级是难以产生的。为了防止控制国家的那部分人独揽大权，有必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权力中心，各种企业和托拉斯应该属于为其工作的人，属于地方或者属于工会，而不属于集权国家。目前由于心理上和技术上的原因这种离心方法还难以实现……还可以考虑权力精英不建立某种宗教或军事组织，而是组成一个民主政党。然而这种想法仍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却难以实现……。另外，在我看来，权力精英所保持的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与这种政权的内在需要是相吻合的……简言之，精英的统一与独揽经济和政治大权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集权本身又是与地地道道的集体经济的计划性紧密相联的。”^①

是否有可能应付这些反对意见并以一种易于接受的方式建立平等社会的理想？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阿宏所描绘的苏联的无阶级社会同米尔斯所展示的美国的民众社会之间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在米尔斯用以区别民主的“公众社会”(society of publics)的民众社会中：一、发生意见的人比接受这些意见的人要少得多，因为公众社会已变为受新闻媒介影响个人的抽象的集合体。二、到处普及的信息交流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方式，以致于个人很难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三、将公众意见变成实际行动的过程已被组织和掌握这种行动的渠道的当局所控制。四、公众无法自由摆脱各种机构的约束，相反，各权威机构的代理人在公众当中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阻止公众通过讨论形成自治倾向。^② 无阶级社会和民众社会最重要的结构性特征之一是中间组织的衰落或消失——一个人在小型的自发性社团的活动中足以发挥其影响——以及各种类型的机构组织中不断扩大的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的距离。显而易见，这些特征在苏联型的社会中

^① 同上，第131-132页。

^② 米尔斯：《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第304页。

比在西方国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西方国家中社团的形成不会遇到政治上或法律上的障碍,大型组织中的忠诚的公民之间存在着公开的和暗中的竞争,但是由于某些较为普遍的原因,两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点,其中包括(由生产、通讯等方面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组织规模的扩大,以及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经济中国国家对经济生产日益增加的控制及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规模的军工生产以及处于备战状态下联合起来的国家之间的世界性抗衡所决定的,这种状况有利于政治领导权集中化和权威化的发展。

所有这些不利的影晌是无法在某一单独的社会中有效地加以克服的;消除这些影响还需要各国关系之间的变化。那些在单独国家的水平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组织的规模和复杂性中产生的,正如阿宏所指出的,是在集中的经济计划所明确显示出的权威倾向中,特别是在集体化经济中产生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不得不沿着几个不同的方向进行,其中一些情况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有所涉及——在可能的情况之下,通过将决策权转移到地方的地区性委员会以及自发性社团,最大限度地分散政治领导权;通过适当建立新型机构,例如今天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以便将自治扩大到经济领域。可以通过不仅将自治概念引入工厂,而且限制集体所有权的范围的办法来对付政治家和工业经理在集体经济中组成新的统治阶级的危险。我认为为了进入平等社会似乎没有必要将所有的小商店、小农场、小作坊都合并到大型的集体企业当中。至少这应该作为现实问题来对待,这种私营经济活动是否会导致新的社会阶级或新的不平等现象的产生这个问题应根据实际情况慎重地加以研究。同样,如果允许教育和文化机构有限大程度的自治权,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付知识分子专政的危险。

在知识分子当中应该有彼此竞争的独立的社团,这是十分

重要的。这种竞争不光涉及广播、电视及新闻机构，同时还包括出版和科研领域，但这有赖于公共事业的发展。各种社团可以很好地由其成员所拥有或有效地加以控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共基金的赞助并遵守当局的一般法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就是这种情况。同一原则还可应用于工业和商业领域。私人企业可以由其工作人员所有，这些人还可决定大多数的有关政策，它们可以至少像私人企业那样在价格和质量方面彼此进行有效的竞争。同时又服从国家计划经济的各种利益。这种公有制加上市场经济的体制在南斯拉夫所取得的成就表明，尽管有许多实际困难，这仍是一种可行的经济组织的形式，而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① 看来没有理由认为在不必首先进行艰苦的资本积累工作的先进的工业社会中，中央计划权威在我所提到的公有制条件下对整个经济的控制需要比在私营经济制度下采取更加严酷的独裁手段；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遇到的将是相似的问题，需要采取的也是相似的手段。以法国为例，战后经济计划的制定者拥有很大权力，他们不受民选代表的严格控制。在英国刚刚成立的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如果其活动有任何意义的话，负责制定政府所采取的限制或鼓励措施。这些措施将带来预期的效果和增长率。

我想上述这些考虑足以使我们对阿宏关于在集体化经济中不可能实现权力分散化，或避免知识及文化的单一化的论断表示怀疑。当然，即使在实现了很大程度的分散，各种独立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无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在社会组织的一

^① 为简要了解南斯拉夫的制度，可参见弗雷德·辛格顿(Fred Singleton)和托尼·托珀姆(Tony Topham)的“南斯拉夫工人的控制手段：最近的阶段”，引自《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第十八期，第73-84页。

般问题上仍然具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但是这种情况必然发生在下面这种社会中,这种社会能够容忍那些认为民主是靠彼此竞争的各种精英维持的,坚持竞争要有一定限度同时又赞同舆论一致的原则的人。平等提倡者们希望在接近这种理想的社会中生活最终会让人们认识到这种社会的价值。即使如此,仍然会出现各种理性的反驳以及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各种选择,但是人们会普遍同意社会平等是值得争取的并且反对那些制造并长期维持各阶层之间差别的不平等现象。

现在让我回到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的观点所引起的另一个问题上。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劳动分工本身不仅阻碍了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一种障碍形式,而且是更加无情地限制了人类自由的社会阶级产生的主要根据。因此,应该“消灭”劳动分工,即取消或超越劳动分工。但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谈什么“取消”劳动分工难道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这个问题乍一看起来比马克思的时代显得更加棘手,因为职业的专业化情况,包括脑力劳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工业大生产领域中,更加细致、更加具体的分工已经发展到使工人越来越像是机器的零件的地步,他们每日的工作仅限于几种简单的、机械的、重复性动作。但是,工作中也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这使得马克思对未来的展望更加具有现实意义。首先,职业的性质发生的变化,这主要是自动化的发展造成的。自动化的结果是使工人们脱离装配线,代之以一位知识水平更高,责任心更强的人,他的任务是监视完全由机器控制的复杂的生产线。目前这些变化仅仅影响了工业领域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们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其次,现代工业的高生产率已使缩短工时成为可能,而且其增长的速度将使先进的工业国家有可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采用每周只工作二十五或三十小时的制度。这些国家中将有可能产生新的革命现象:即出现一个由整个人口

构成的“有闲阶级”。在美国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条件的最初一些迹象：例如在1962年，电业工人国际兄弟协会（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Electrical Workers）纽约分会为某成员争取到了每天基本工作五小时，每周二十五小时的条件。^①再其次，如果在公有工业企业中引进我前面讨论过的自我管理，并且如果这种公有制情况扩大到所有大型企业中，体力工人和职员工作活动的范围将会大大扩展。工人的活动将不再局限于他的特殊工作任务，他还将参与生产计划和管理工作。

工作的组织方面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变化将会深刻改变劳动分工的含义。有足够闲暇的个人将会像马克思所相信的那样有机会致力于丰富多彩的活动，将在体力和智力等各个方面充分发挥才干；而且即使作为经济生产者他也将找到更多的机会通过参与管理工作和学习作为工业活动基础的科学技术来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劳动分工将会更加明显地变成人类不得不用以生产生活资料的一种方式，不过人类必须控制这种方式；它将不再影响或限制人类的整个生活，不再把人变成一成不变的装配线旁的普通工人、企业大亨或政界巨头。这些变化预示着，并且已经开始引起各种形式的教育的迅速发展——中学教育学制已普遍延长，相当一部分年龄在十八到二十一岁之间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大规模的成人教育，为那些成年之后决定为新的职业作准备的人提供特别的教学设备——以及大量提供体育和娱乐设施。也许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引用一位对未来社会中劳动的作用的看法与马克思十分相似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明新的激进思想是怎样缓慢地发展起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73年发表的《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① 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在《工作的分析》中从一种与我本人十分相似的观点出发详细地考察了劳动分工和闲暇时间增加的状况。

Working Classes)一文中写道：“人类习惯于承受每日八小时、十小时甚至十二小时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个司空见惯的事实使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在何种程度上支配了精神和思维的历史；我们几乎意识不到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阻碍人类生长发育方面产生了何种难以察觉的、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说，它是人体本能的健康的积极的活动，是生活的目的，是生活本身；在此意义上每一个人（在马歇尔构想的理想社会中）都将是比现在更加完善的工人。但是人们将不再从事繁重到影响他们更高级的智能发展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从劳动压垮了人的生活的最消极的意义上说，这种劳动是有害的。人的活动将不断发展，从人类世世代代的经历中我们越来越坚信人是由于其职业而变成风度翩翩的绅士的……在我们所描绘过的条件中……在人们的精力与才能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中——那时人们所做的不仅不比现在少而且更多，只是用一句老话形容，他们的大部分工作都将是爱的工作；这种工作不管是否有报酬，都会有助于他们发展才干。过度的体力劳动则使人没有什么机会让其更高一级的素质自由发展，单有这种素质是无法发展的，但如不加以培养，它亦将最终消失，如果工人阶级是指那些承受过度繁重的工作以致于最后累垮的人们的话。”^①

这样我已经考察了那些反对无阶级的平等的社会思想的一些主要观点。这些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暴政和政治专政是主要危险。不过还有一种重要的相反观点，这种意见提到了精英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人们通常认为文明的进步曾经是、并且一直是依靠少数天才人物实现的。加西特(Ortega y Gasset)在《群众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中写道：“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

^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工人阶级的未来”引自皮古(A. C. Pigou)所编的《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第101-118页。

意识到大多数男人——以及女人——所能做的不外乎对外界压力作出反应。所以我们所遇到的能够自发地、充满乐趣地进行努力的少数人才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格外孤独。这就是那些出类拔萃的卓越人物，是那些贵族人物，是唯一能够积极采取行动而不是消极作出反应的人。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不断奋斗，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过程。”^①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文明》(*Civilization*)一书中表示文明社会是以理性和价值观为特征的，而这些特征是精英所独创、培养并保持的。现在这些学者的论断有些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即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卓越人物的工作所推动的(也正是另一些特殊人物阻滞了文明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与他们的同伴或追随着形成了社会精英，更不意味着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变为统治精英。他们在社会上有可能是默默无闻的，社会统治者可能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最终有可能需要上层阶级的保护和资助，但却无法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以个人方式作出的，而不是一般依靠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集团来完成的；往往还要受到他们的工作唤起的全部人口(例如公元五世纪的雅典)或整个阶级(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或十八世纪的法国)的热情支持的强大影响。按照帕雷多所给的精英的第一个定义，卓越人物——即在其活动领域中水平最高的人——有可能组成精英，除非包括那些与文明的进步没有什么关系的活动，或者这种意义上的精英是由最有才华的人而不是由那些最有创造力的人所组成的。用其他的字眼可能会更加恰当；例如：“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一词。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中似乎使用这个词指代各种不同的个人而不是精英集团。他说：“在社会创造的所有行动中，创造者是富有

^① 同上，第49页。

创意的个人或至多是具有创造性的少数……”^①

那些通过强调知识和艺术的创造性以捍卫精英学说的人犯了以下两个错误：第一，他们否认富有创造性的个人与他们生活的社会之间的至关重要的相互作用——也许科学工作能够为此提供最好的例证，但在追溯绘画、建筑、文学、宗教运动和道德改造的历史时也可以得到明确的佐证——以及第二，他们认为这些个人联合成为一种或几种精英组织。这种精英组织只有在等级社会中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划分成稳定的、持久的阶段的社会中才能得到最佳生存环境。艾略特在《关于文化定义的笔记》中提到了上面最后一点时，他讨论的主题从文化的创立变成了文化的传播。依照艾略特的观点，在所有错综复杂的大千世界中都存在一些不同的文化层次，为了使社会能够健康发展，这些不同的层次应该彼此联系，同时保留各自的特征，整个社会风尚和趣味应该以最高层次的文化为楷模。因为文化主要是通过家庭进行传播的，因此只有在由能够将某一固定的生活方式延续几百年的家庭所组成的上流社会存在时，这种状况才会出现。艾略特承认上流社会的存在不能确保高级文化：“……我所确立的‘文化的条件’不一定能够带来更高层次的文明：我只认为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则不大可能找到更高层次的文明。”^② 尽管如此，这种文明仍是可能找到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直接的平等社会生活方式的经历，因此我们充其量只能推测平等社会有可能创立并保留高层次的文化。创造是个人的行为，但却得

^① 《历史研究》，第三卷，第239页。然而，当他在最后一卷中回顾了他的工作时，他已非常接近精英理论：“谈到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我指的是那些少数统治者，人类天性中的创造才能在他们身上得以充分发挥并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采取有效行动。……谈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少数人时，我指的是那些很少靠自身魅力，而更多地是靠强力进行统治的少数人。”（同上，第十二卷：“回顾”，第305页）

^② 同上，第49页。

到社会广泛的热情支持，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闲暇普遍存在并且鼓励个人充分施展才华的平等社会的创造力至少可以和那些在早期经济状况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迅速变化时创造了巨大成就的社会相媲美。谈到高层次文化的保留与传播，我们有理由反对关于这一工作应由家庭完成的观点。以往许多社会集团——宗教团体、哲学机构、各种研究院——在传播文化方面至少都起到了和家庭同样重要的作用；家庭，即上流社会家庭，通常继承了（如果它们确实继承的话）某些成员并不稳定的社会团体所保留的东西。高层次文化和低层次文化的差距在无阶级社会中并不显著，而地方色彩则显得引人注目；文化遗产同过去相比更多地是由教育机构和各种自发性的团体所继承，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由某些特殊的家庭保留下来。在当今社会中对于维持阶级特权密切相关的文化的保存有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重视——至少将有某种改变——将更有可能采取听其自然态度，而建立新型文化，在艺术和科学中开辟新的领域的创造性将受到高度重视和鼓励。

精英理论家们就是这样以种种方式捍卫昔日不平等社会的遗产，同时也对平等精神作出一定妥协。他们坚持认为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并将其视为一条科学的定律，但在认为民主意味着精英之间的竞争的条件下，他们也愿意给民主以一席之地。他们接受并认可对社会的阶级划分，却竭力将上层阶级描写成精英，并宣称精英是由天才人物所组成，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以便使这种划分符合人们的胃口。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通过以机会平等的观点替代平等思想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机会平等的观念除了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之外，实质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观点所要表示的机会平等，首先就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因为“机会”意味着“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同时它也是以平等为先决条件的，这就意味着应该不断反对社

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以便使个人能够真正发挥才能;而且所有对机会平等的条件的调查,例如在教育领域中,都表明社会阶级的深刻烙印对个人在生活中的机会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机会平等只有在没有阶级或没有精英的社会中才会变为现实,那时这个观点将是多余的,因为每一代人在生活中得到平等的机会将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关于机会的观点将不意味着为进入上流社会所进行的种种奋斗,而是指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全面发展他作为个人在与他人无拘无束的交往中所具有的聪明才智。

主要参考书目

General Studies of Elites

ARON, RAYMOND,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uling Cla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I(1), March, 1950, PP. 1 - 16 and I (2), June, 1950, PP. 126 - 43.

ARON, RAYMOND, Classe sociale, classe politique, classe dirigeant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2), 1960, pp. 260 - 81.

BORKENAU, FRANZ, Pareto (London, Chapman & Hall, 1936).

BURNHAM, JAMES, *The Machiavellians; Defenders of Freedom* (London, Putnam & Co., 1943).

CLIFFORD - VAUGHAN, MICHALINA, 'Some French Concepts of Elit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XI(4), December, 1960, pp. 319 - 31.

COLE, G. D. H., *Studies in Class Struc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5), Chap. v, 'Elites in British Society'.

DREITZEL, HANS P., *Elitebegriff and Sozialstruktur*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1962).

GINSBERG, M., 'The Sociology of Pareto', in *Reason and Unreason in Societ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47).

JAEGGI, URS, *Die gesellschaftliche Elite; Eine Studie zum Problem - der sozialen Macht* (Bern, Paul Haupt, 1960).

LASSWELL, HAROLD D., LERNER, DANIEL, and ROTHWELL, C. EAST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 (Hoover Institute Studies, Series B: Elites, No. I, Stanford, 1952).

MEISEL, JAMES H., *The Myth of the Ruling Class: Gaetano Mosca and the Eli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8) [Contains a bibliography of Mosca's writings].

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MOSCA, GAETANO,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39).

NADEL, S. F. 'The Concept of Social Eli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VIII(3), 1956, pp. 413 - 24.

OSSOWSKI, STANISLAW, *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

PAETO, VILFREDO, *Les systemes socialistes* (Paris, Marcel Giard, 1902).

PARETO, VILFREDO, *The Mind and Society* (4 vol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5)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 1915 - 19'.

SCHUMPETER, J. A.,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1).

SERENO, RENZO, 'The Anti-Aristotelianism of Gaetano Mosca and its Fate', *Ethics*, XLVIII(4), July, 1938.

Political Elites

GUTTSMAN, W. L.,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63).

MCKENZIE, R. T.,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Heinemann, 2nd ed. 1963).

MARVICK, DWAIN (ed.),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1) 'The Introduction Provides a survey of cur-

rent research'.

MATTHEWS, D. 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ers* (New York, Doubleday, 1954).

MICHELS, ROBERT, *Political Parti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English trans. of *Zü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2nd ed., Leipzig, 1925'.

OSTROGORSKI, M.,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08) 'English trans. of *La démocratie et l'organisation des partis politiques*, Paris, 1903'.

RUNCIMAN, W. G., *Soci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ap. IV, 'Elites and Oligarchies'.

Owners and Managers of Industry

ACTON SOCIETY TRUST, *Management Succession* (London, Acton Society Trust, 1956).

BALTZELL, E. DIGBY, *An American Business Aristocrac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Philadelphia Gentlemen: The Making of a National Upper Class*, 1958).

BERLE, A. A. and MEANS, G. C.,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BURNHAM, JAMES,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London, Putnam & Co., 1943).

CLEMENTS, R. V., *Managers: A Study of their Careers in Industry*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

COPEMAN, G. H., *Leaders of British Industry: A Study of the Careers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Public Company Directors* (London, Gee & Co., 1955).

FLORENCE, P. SARGANT, *The Logic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ndust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3).

MILLER, WILLIAM (ed.), *Men in Busines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 (New York, Harper & Row, new ed. 1962).

TAUSSIG, F. W. and JOSLYN, C. S.,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32).

VEBLEN, THORSTEIN,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21).

WARNER, LLOYD W. and ABEGGLEN, JAMES C., *Big Business Leader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1955).

Bureaucrats

ARMSTRONG, JOHN A., *The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A Case Study of the Ukrainian Apparatus* (London, Stevens & Sons, 1959).

BENDIX, R., *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American Society* (Boulder, University of Colorado Press, 1949).

BLAU, PETER M., *Bureaucracy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BOTTOMORE, T. B., '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France', *Transactions of the Second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Lond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54), Vol. II, pp. 143 - 52.

DJILAS, M., *The New Class*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57).

EISENSTADT, S. N.,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Empires* (New York, Collier Macmillan, 1963).

KELSALL, R. K., *Higher Civil Servants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5).

KINGSLEY, J. DONALD,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Yellow Springs, Antioch Press, 1944).

STEWART, JULIAN H., *Irrigation Civiliz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Washington, Pan American Union, 1955).

WEBER, MAX, 'Bureaucracy' in *From Max Weber* 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London, Kegan Paul, 1947).

WITTFOGEL, K. A.,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Intellectuals

ARON, RAYMOND, *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7).

BENDA, JULIEN, *La trahison des clers* (Paris, Grasset, 1927).

BODIN, LOUIS, *Les intellectue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2).

DE HUSZAR, GEORGE B., *The Intellectuals: A Controversial Portrait*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0).

GRAMSCI, ANTONIO, *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 (Milan, Einaudi, 1955).

LE GOFF, JACQUES, *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57).

LIPSET, S. M., *Political Man* (London, Heinemann, 1960), Chap. X, 'American Intellectuals: Their Politics and Status'.

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London, Kegan Paul, 1936) Chap. III, sect. 4, 'The sociological problem of the "intelligentsia"'.
 \

- MANNHEIM, KARL,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London, Kegan Paul, 1940) Part II, Chaps. VIII – IX.
- MICHELS, ROBERT, 'Intellectuals',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by E. R. A. Seligman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Vol. VIII, pp. 118 – 26 [An extensive bibliography is appended to the article].
- WEBER, MAX, 'The Chinese Literati' in *From Max Weber* 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London, Kegan Paul, 1947).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 BRINTON, CRANE,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rev. ed., 1957).
- DAHRENDORF, RALF, 'Über einige Probleme d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Revolu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I(1), 1961, pp. 153 – 62.
- GIRARD, ALAIN, *La réussite sociale en France : ses caractères, ses lois, ses effet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1).
- KOLABINSKA, MARIE, *La circulation des élites en France : Étude historique depuis la fin du XI^e siècle jusqu'à la Grande Révolution* (Lausanne, Imprimeries Reunies, 1912).
- LIPSET, S. M., and BENDIX, R.,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 MARSH, ROBERT M., *The Mandarins :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in China , 1600 – 1900*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1).
- MILLER, S. M.,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Current Sociology*, IX(1), 1960, 89.
- PIRENNE, HENRI, 'Les périodes de l'histoire sociale du capitalisme', *Bulletin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Belgique*, mai, 1914 'English trans.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pril, 1914 .

Elites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LMOND, G. A. and COLEMAN, J. S. ,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Contains five useful area studies on South-east Asia, South Asia, Sub-Saharan Africa, the Near East and Latin America' .

BERGER, MORROE, *Bureaucracy and Society in Modern Egypt. A Study of 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FRIEDMANN, GEORGES, *Problemes d'Amerique latine* (Paris, Gallimard, 1959) .

FRIEDMANN, GEORGES, *Signal d'une troisieme voie?* (Paris, Gallimard, 1961) .

HODGKIN, THOMAS,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 Introductory Guid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1) .

KERR, CLARK, DUNLOP, JOHN T. , HARBINSON, FREDERICK H. and MYERS, CHARLES A. ,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ee especially Chap. 3, 'The Industrializing Elites and their Strategies'' .

LIEUWEN, EDWIN, *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rev. ed. 1961) .

MISRA, B. B. , *The Indian Middle Class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NIEL, R. VAN,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onesian Elite* (The Hague, W. Van Hoeve, 1960) .

PYE, LUCIAN W. , 'Armie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I(1), 1961' pp. 82 - 92.

SHILS, E., *The Intellectua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Indian Situation* (The Hague, Mouton & Co., 1961;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upplement I).

SMYTHE, H. H. and SMYTHE M. M., *The New Nigerian Eli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UNESCO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VIII (3), 1956. Symposium on 'African Elites', pp. 413 - 88.

WERTHEIM, W. F., *Indones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Social Change* (The Hague and Bandung, W. Van Hoeve, 2nd ed. 1959).

Elites and Democracy

BELL, CLIVE, *Civilization: An Essa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28).

MANNHEIM, KARL,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London, Kegan Paul, 1940), Part II, Chaps. II - VII.

MANNHEIM, KARL,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6), Part III,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SCHUMPETER, J.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1943).

UNESCO, *Democracy in a World of Tensions*, ed. by Richard McKeon (Paris, UNESCO, 1951) 'See especially the essays contributed by G. C. Field, Lord Lindsay, S. Ossowski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Other Works Cited in the Text

ARON, RAYMOND, *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 (Paris, Cal-

mann - Levy, 1962).

BLOCH, MARC, *Feud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

BOTTOMORE, T. B. (ed.),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Watts & Co., 1963).

CROCE, BENEDET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London, Howard Latimer, 1913).

ELIOT, T. S.,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Faber & Faber, 1948).

FINER, S. E.,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London, Pall Mall Press, 1962).

FRIEDMANN, GEORGES, *The Anatomy of Work* (London, Heinemann, 1962).

FRIEDRICH, CARL J., *The New Image of the Common Man* (Boston, Beacon Press, 2nd edn., 1950).

GRAMSCI, ANTONIO, *Note sul Machiavelli, sulla politica e sullo stato moderno* (Milan, Einaudi, 1955).

LÜTHY, H., *The State of France*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55).

NOMAD, MAX, *Rebels and Renegades*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ORTEGA Y GASSET, JOSE,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1930; English trans. 1932; new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61).

PIGOU, A. C., (ed.),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London, Macmillan, 1925).

ROUSSEAU, J. - J., *A Dissertation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the Inequality of Mankind* (in the Everyman edition of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 Dent & Sons, 1913).

SAMPSON, ANTHONY, *Anatomy of Britai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62).

SIEGFRIED, ANDRE, *De la IIIème à la IVème République* (Paris, Grasset, 1957).

STRACHEY, JOH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Gollancz, 1956).

TAWNEY, R. H., *Equality* (London, Allen & Unwin, 4th ed. 1952).

TITMUSS, RICHARD 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TOYNBEE, A. J., *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61).

WEBER, MAX,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London, Kegan Paul, 1947).

WEBER, MAX,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9).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1).